

細說張國燾

前言

張國燾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開創人之一，是中共黨徒唯一見到列寧的人；他在中共曾經担任過很多重要的職務，有過艱苦奮鬥的史實；也是與毛澤東發生衝突，一再遭受侮虐鬥爭，始終不屈，最後毅然出走脫離中共，而敢於公開發表言論，指斥中共政治路線錯誤的一人。同時，也是中共高級人員中，晚年能享受天倫之樂，安靜去世的一人。

張國燾一生的事蹟，貫穿中國近代時事，有很多不爲人所習知或者爲人傳聞所誤的隱秘事實，極具充實近代史料的價值。而其與毛澤東的衝突分裂，以及受到史達林生命威脅的經過，種種秘辛，也極具警惕教訓的意義。

另外，張國燾來歸以後，有人以爲國民黨未能善加運用他，利用他在中共的地位與關係，從事分化中共、打擊中共的活動；也有人以爲未能給他很高的職位讓他發揮所長，報效國家，以廣招徠。這些想法是有問題的。

首先，張國燾之脫離中共出走來歸，自有他迫不得已的原因；但他並不是反對馬、列共產主義，並不是反對中共組織。而在他到達武漢之初，即曾間接的向蔣委員長表示，他不願担任任何黨政職務；同時，在他的心目中，往往存有一種猜忌心理：「我在國民黨人眼中，是身家不清白的人」，而對我黨政措施，仍存有「獨裁專政」的偏頗成見。再說，國民黨與中央政府對他，曾經給他好幾次超然清高地位的服務機會，也由於他的消極情緒和倔強個性，落個有始無終。最後，當他晚年在加拿大多倫多老人病院養病時，我政府仍然雪中送炭的送一筆醫藥費給他。國民黨對他，可算是仁至義盡了。

其中經過曲折，確有分析敘述，公諸大眾的必要。茲就筆者四十年來研究中共問題所認知的有關資料，參證張國燾自己的回憶，和一些鮮為世人所知的掌故，對張國燾的一生，作一客觀的介紹，以供讀者參閱。

愛國青年學生要人

張國燾，別名張特立，一八九七年（光緒廿三年）出生於江西萍鄉縣北鄉的上栗市，距縣城八十里，但西面距離湖南的瀏陽、醴陵的邊界，都不超過廿里，所以風俗習慣上接近湖南，歷代相傳，多為讀書人，各房都有田地；他父親還是滿清最後一屆的拔貢生，可以說是個鄉紳之家。

由於中山先生所發動的「丙午萍瀏之役」，上栗市就是一個重要的據點；同時，萍鄉也是革命黨人經常活動的地區。當他就讀萍鄉縣立小學時，又從少數親友和教員中，得到些維新變法和革命排滿的消息，所以他成爲一個革命同情者。就讀萍鄉中學時，曾經在國民黨二次革命反袁世凱之役中，幫助一個叫「陳矮子」的黨人，秘密搬運違禁物品，接送人員。民國四（一九一五）年一月，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提出廿一條密約的消息被揭露。他已轉學南昌心遠中學，風氣較萍鄉更爲開通，於是，經常閱讀報刊，留心時事，逐漸「關心國事」的熱忱，超過了「追求科學知識」的願望，終於使他成爲一個狂熱的愛國者。

民國五（一九一六）年秋天，他由上海北上北京，入北京大學爲理工預科一年生。最初埋頭讀書，成績優良。次年春，陳獨秀任北大文學院院長，創辦「新青年」刊物，在胡適之等人的呼應下，發起了「新文化運動」，引起一場「新舊文學」的大論戰。他受到很大衝擊，不甘落伍，自命爲力求上進的時代青年，不但熱烈擁護陳、胡的立場，而且常與反對者展開爭論；甚至還把一些宣傳新思潮的書刊，寄回家鄉給他父親看。

歐戰結束，他和北大圖書館的李大釗來往密切，因而對社會主義發生興趣；並且和鄧中夏、羅章龍等同學，組成「平民教育會」，標榜社會改造，應從平民教育入手。五四運動，他被推選爲學生聯合會的講演部長，領導各學生講演團，從事提倡國貨，抵制日貨，組織民衆團體，發行傳單報刊等活動。由於講演團毫無顧忌的攻擊北京政府和親日派，造成人心憤慨的情勢。北京政府在日本的外交壓力之下，積極嚴禁

學生講演和抵制日貨等活動。六月二日，他主持的講演部通過決議，不理會北京政府禁令，恢復並擴大講演活動。當他和十幾位同仁到達天安門一帶向群眾講演時，與警察發生衝突，他們被捕了。

愛國學生被捕，引起各方面公憤。六月三、四兩天，北京各校學生，幾乎全部出動，恢復露天講演，北京的軍警惱羞成怒之下，竟然逮捕了上千名學生。這種狂妄的高壓手段，激動了全國，各大城市相繼罷課、罷工、罷市，以示抗議，終於迫使北京政府讓步，釋放被捕學生，罷免親日官吏。最後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在各方面輿論的壓力之下，也在六月廿八日正式向巴黎和會表示拒絕簽字。

民國八（一九一九）年七月，陳獨秀和「北京學生聯合會」的十一位重要負責人魯士毅等先後被捕，當時正是暑假時期，多數學生已離校返家，而抓去的也僅是北大的師生，無法再像「五四」一樣的，發動大規模的運動。張國燾被推舉為「學生聯合會」的主席，設法處理此事，他和北平各院校長、教職員和學生取得聯繫，大家採取同一步驟。八月底，北京地方法院才宣告偵查終結，正式開庭審訊。「學生聯合會」發動了一千多學生，於開庭當天去旁聽，滿佈法庭內外，實際向法庭示威，反對當局非法拘禁學生達兩月之久，要求立即釋放。終於使審判長當庭宣告各被告無罪開釋。

十月，北大開學，他辭去學生會的一切職務，參加一個以「無政府主義思想」為基礎的「曦園」組織，以互助、共同生活、親自勞動為宗旨。由於他非常賣力，被同仁戲稱為「學生要人」。這時他感覺到才廿二歲，還應當努力完成大學學業，為自己的前程打基礎。

可是，十二月的某一天，警察又到「曦園」去逮捕正在廚房燒飯的他。幸而他以機警的掩飾，逃過了這一關。事已如此，他祇好悄悄的離開北京，前往上海。在上海，他和國民黨的要員胡漢民、汪精衛、朱執信、廖仲愷、戴季陶、葉楚傖等常有過從，並且曾經兩度晉見孫中山先生。他對孫先生的雍容大度和精深學識非常佩服，認為孫先生確是一位值得敬佩的、坦誠的大政治家。

民國九年（一九二〇年）五月，爲了完成北大學業，他又回到北京。

南北奔走創組共黨

先是民國八（一九一九）年七月廿五日，蘇俄政府發表對華宣言，表示廢除帝俄時代對華特權，取消庚子賠款，歸還中東鐵路，高唱「無割地、無賠償的和平」。消息傳來北京以後，立即爲學生界和文化團體所歡迎，對蘇俄有了好感。

李大釗本來是北京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心人物，他所主持的北大圖書館，已成爲左傾思想的發祥地，自蘇俄政府發表對華宣言後，他更常以俄國革命作爲談助。

張國燾回到北京，第二天就去見李大釗，商談之下，認爲當前救國的途徑，祇有效法蘇俄；而蘇俄革命其所以成功，得力於俄共的領導。一切問題，必須先從了解馬克思主義着手。於是，他在李大釗的啓發下，開始有系統的研究馬克思主義。當時，他和李大釗祇熱衷於馬克斯主義的介紹，和工人運動的實際推進

，都沒有組織中國共產黨，與共產國際聯繫的決心，祇主張組織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，暫不實際過問政治。

上海方面，共產國際東方支部長胡定康（Gregori Yunnsky），已經來華與陳獨秀取得聯絡，積極籌組中國共產黨，已獲得李漢俊、李達、陳望道、沈定一、邵力子、施存統等人的贊助。陳獨秀曾經寫信給李大釗，主張採取實際行動，大幹一場。

七月初，北京局勢緊張，直皖戰爭一觸即發，爲了避免親日派的壓迫學生領袖，同時也爲組織中共問題，和陳獨秀商討；張國燾在李大釗的促使下，再度離京南下上海。在上海，他住在陳獨秀家中兩個星期，普遍討論組黨問題。由於他們對馬克思所說「工人無祖國」，尙不能接受，對「無產階級革命」與「民族獨立革命」、「民主革命」之間的關係，尙不夠明瞭，於是不主張先發表「共產黨宣言」，甚至連黨綱和政綱，也應留待正式成立以後再作決定。

陳獨秀認爲最重要的是展開各項實際工作，應當先在各重要地方組成中共小組，立即開始宣傳、組織工作。特別着重於重新組織工會，在工人中宣傳共產主義，吸收先進工人做黨員；同時選用各種形式來組織更廣泛的青年，讓他們參加多方面的工作；利用知識婦女，發動組織廣大婦女群眾。

陳獨秀很急於在各地發動中共小組的事，除了上海以及蘇、浙、皖一帶，由他自己負責外；他希望李大釗和張國燾從速在北方發動，先組織北京小組，再向山東、山西、河南等省和天津、唐山等地發展。因

此，張國燾乃於民國九年（一九二〇年）八月底，再回北京。

在李大釗的贊成支持之下，中共的北京小組於九月中旬開會成立，十一月底，正式命名為「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」，李大釗為書記，張國燾擔任組織工作，指導職工運動，羅章龍擔任宣傳工作，主編「勞動者週刊」，共有黨員十五人。另外有相關機構：「社會主義青年團」，約四十人，大都為北大同學，由高尙德為書記；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」，由李大釗負責。

民國十（一九二一）年七月一日，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，共出席代表十三人（當時黨員五十九人，另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約三百五十人），張國燾代表北京支部，被推為大會主席（因為主要負責人陳獨秀在廣東，未能出席大會），並且修正通過了他所草擬的黨綱、政綱草案。大會推舉陳獨秀（書記）、張國燾（組織）、李達（宣傳）為執行委員，組成「中共中央」。

赴莫斯科晉見列寧

職工運動，是中共認為最重要的工作，張國燾就是最先發動的人。距離北京廿一公里，有一個京漢鐵路車站「長辛店」，因為設有修車廠，所以有一千多名工人。五四運動時，張國燾曾經前往講演，並且發展十人團的組織，與當地工人有一段和善的淵源關係。

當民國九（一九二〇）年九月，「北京小組」正式成立後的第三天，張國燾就去長辛店，進行職工運

動，先從適應工人需要着手。很快的租到一所房子，籌措一點經費，創辦一所工人子弟學校，白天教育工人子弟，晚上幫工人補習，不收費用。由「社會主義青年團」的團員李實當教員，姓武的天主教徒辦雜務。他本人每週由北京前往一次，住一晚；晚上對工人演講，鼓勵工人如何改良生活，組織工會。

由於學校辦得不錯，人數不斷增加，於是改名為「長辛店勞動勤務補習學校」，漸漸的成為調解糾紛的仲裁場所，代寫家書文件、顧問醫藥的服務處。張國燾每週一次的個人活動，也擴大到常去工人住所訪問，勸導他們應當建立屬於自己的組織。終於在民國十（一九二一）年五月，正式成立「工人俱樂部」，通過章程，選舉職員，成為中共在工人群眾中建立的第一個陣地。

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，張國燾以中央組織部長的身份，在上海籌組一個組織工人運動的中央機構：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」，規定在上海設立總部，除指導全國工運外，並且兼辦上海區的工運工作，創辦「勞動週刊」；另在北京、武漢、廣州、長沙等地設立分部，出版地方性的工人刊物。

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」於九月正式成立，張國燾被推舉為上海總部主任，李啓漢為秘書；北方分部由鄧中夏、羅章龍負責；武漢為林育南、項英；湖南為毛澤東；廣州為譚平山。十月，張國燾又被推選為出席「遠東勞者人民大會」的中共代表，第一次前往蘇俄。中國除了中共以外，尚有其他各方面的代表，大會決議組成代表團，推舉張國燾為代表團主席。

大會原擬在西伯利亞的伊爾庫斯克召開，後來改在莫斯科。當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年）一月廿一日

開會時，張國燾被推舉爲十八個主席之一，並且和代表國民黨的張秋白、代表鐵路工人的鄧培，一同應約去見列寧。

這次俄國之行，使他產生一種基本上的觀感：他贊成武裝革命，也佩服俄共組織的健全和革命後的若干措施；但覺得俄國革命過份依賴暴力，與中國革命傳統不合；尤其對無止境的鬥爭，發生反感（這與他後來脫離中共有很大影響）。

張國燾由蘇俄返國後，爲了確立中共在工人群眾中的領導地位，蓬勃職工運動，由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」發起，於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年）五月一日，在廣州召開「全國勞動大會」，出席代表一百六十二人，代表一百一十幾個工會，工人廿萬人；大部份來自香港、廣東。由張國燾宣佈開會，譚平山、鄧培、黃煥庭、林偉民、謝英伯爲主席團；而以譚平山執行主席職務。張國燾因爲不通粵語，從幕後加以策動，草擬大部份的決議案交付通過。當經決定在全國總工會尙未組成以前，委託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」爲各地工會的總通訊處，負責召集「全國第二次勞動大會」。因此，中共開始從實質上獲得了全國職工運動的領導地位。雖然，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」表面上並不帶共產色彩，在上海已合法存在。可是，由於他曾經支持香港海員罷工，此次又負責召集全國勞動大會，成爲全國工會的總通訊機關，於是引起公共租界當局的嫉視，而於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年）九月，封閉該「書記部」及其出版的「勞動週刊」，捕去秘書李啓漢，判處三月徒刑後，驅逐出境。於是「書記部」祇好遷往北京，由鄧中夏接替主任；張國燾則

因「中共中央」書記陳獨秀出國，暫代其職務。

當時，吳佩孚於戰勝奉系以後，通電保護勞工，北方與兩湖地區，工會可以公開組織，罷工可以公開進行；工人運動，正是欣欣向榮時期。吳佩孚且曾要求李大釗，介紹六個共產黨員給交通部（部長高恩洪爲吳的親信），分任各重要鐵道的密查員，考察各路的積弊；用以排除盤據鐵路上的梁士詒的交通系勢力，以便因此接管鐵路財務，增加財源。可是，中共的幹部，却把吳佩孚交付的任務置於不顧，反而藉此掩護，大幅度推展其純粹的職工運動。從此，各地工會組織和參加人數大爲增加，罷工運動也風起雲湧。於是，惱怒了吳佩孚，引發一場鎮壓工運的大風暴。

民國十二（一九二三）年二月一日，中共在鄭州舉行「京漢線全路工會的代表大會」，準備正式成立「京漢鐵路總工會」，張國燾奉派前往指導。鄭州工人列隊遊行，慶祝總工會成立，却遭受吳佩孚的下令取締，工人與軍警發生衝突。由於軍警拒絕任何緩衝和解方式，引起沿鐵路線工人的憤怒，實施以武漢爲重點的大罷工。七日，湖北督軍蕭耀南下令以屠殺方式對付罷工，當天就殺了卅七人，逮捕八十餘人。並且把拒絕下令復工的林祥謙等四個工會負責人斬首示衆。張國燾看到事態嚴重，爲了減少犧牲，保存實力，以圖再舉，他力排衆議的主張「應當退却時，就應迅速退却」，下令各地立即復工，平息了一場風波；他個人於二月十二日潛回北京。

北方，長辛店一帶的工會組織，以及各站的「工人子弟學校」、「工人補習學校」、「工人俱樂部」

等機構，都遭到封閉；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」所創辦的「勞動週刊」也被禁止發行。

中共的職工運動，受此嚴重打擊，除了湖南地區尚有少數組織繼續活動外，其餘幾已大部被摧殘。因此，包括張國燾在內的中共領導人物，已認清工人罷工，並不能抵抗軍閥的武力，只有革命的武力才能對抗軍閥的武力；因而對國民黨在廣州建立革命武力，擴大革命基地的做法，寄予很大的期望。

爲國共合作鬧意見

國民黨與中共第一次合作醞釀的期間，張國燾曾經強烈的反對。

民國十一年前後，中國共產黨雖然已經成立，畢竟還是僅有幾十個黨員的小集團，仍難獨自舉步的發揮「革命」力量。因此，共產國際想到利用國民黨，曾經派人向孫中山先生提出「聯合戰線」的建議，遭到嚴詞拒絕。於是另外設計一條路線，那就是鑽到已有長期奮鬥歷史的中國國民黨裏去寄生、發育、壯大。而爲達成此一目標來華接洽奔走的，就是馬林（Marling）。

可是，當馬林於民國十一（一九二二）年八月在杭州西湖召開「中共中央特別會議」，用冠冕堂皇的語調提出此案時，却遭遇到陳獨秀、張國燾、蔡和森、高尙德等人的反對。以爲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，會沖淡了共產黨的階級性，損害了共產黨的獨立性。經過馬林以「利用國民黨名義，才能吸收到群眾，拉攏國民黨左派，可以造成國民黨的分裂」爲由，加以勸說，並且用「服從共產國際的權威」責成壓制，當

時陳獨秀已提出「有條件的服從」，惟有張國燾堅持己見，不稍讓步。激起馬林怒火，竟以張與蔡、高搞黨內小組織爲由，聲色俱厲的對張國燾大施壓力；張也還以顏色，指斥他發言無禮而荒謬。

「西湖會議」後五天，陳獨秀、李大釗和馬林分別前往拜訪孫中山先生。孫先生當即贊成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，以促成國共合作的主張。再幾天後，陳獨秀、李大釗、蔡和森、張太雷等，由張繼介紹，正式加入國民黨爲黨員。九月初，張國燾也由陳獨秀介紹，加入國民黨爲黨員。

國共第一次合作，在馬林的撮合之下，又有蘇俄外交官越飛與孫中山先生在上海相見之事。雙方經過長期會談，於民國十二（一九二三）年一月廿六日發表「孫越宣言」，主要闡明：「蘇俄對國民黨的援助，是爲達成民國統一與國家獨立；共產主義不能在中國實行；蘇俄先前宣佈的『放棄對華一切特權』，仍然有效。」

五月，馬林從莫斯科返回上海，攜有共產國際給「中共中央」的特別訓令，要求中共立即擴大與國民黨的合作，並提議中共從速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。

共產國際給「中共中央」的特別訓令各要點爲：

1 國民革命是中國革命當前的中心任務。

2 中國國民黨是領導國民革命的重心，中共黨員應加入國民黨，並在國民黨內積極工作，以期實現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工具——軍閥在中國的統治。

3. 中共在這一國民革命中，仍應保留組織的獨立和政治批評的自由。

4. 職工運動仍是一個獨立的運動，中共應積極促進其發展。

馬林並曾向張國燾特別加以解釋這一訓令的基本精神，是以完成國民革命為中心任務，所以：

1. 所有中共黨員均應加入國民黨，並在國民黨內積極工作，一切工作歸國民黨。

2. 所謂組織獨立與政治批評自由，不可過於強調，以免有損國共合作。

3. 職工運動也是國民革命的一部份，中共黨員應該吸引大量工人參加國民黨，俾能接受國民革命的領導。中共至多只能在工人中間進行一些階級教育。

此一解釋，遭到張國燾的強烈反對，他以為：

1. 國民革命只是一個中心任務，並不是中共的唯一任務；除國民革命外，中共還有階級鬥爭。

2. 不必全體黨員都加入國民黨，尤其是中共各級領導工作者和職工運動者，以「保留組織獨立」；即使使在國民黨內工作者，也不可隨聲附和，喪失他共產黨的原來面目。

3. 職工運動，是中共所領導的獨立運動，不能領導其成為國民黨的職工運動。

4. 馬林的解釋，顯已違反共產國際「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不應與國民黨合併……不可隱藏自己特殊的旗幟」等決議。

雙方爭論至為激烈，馬林指斥張國燾仍保留過去建立國共聯合戰線的左傾思想，輕視國民革命，反對

加入國民黨的基本政策。張則指斥馬林犯了右傾主義錯誤，企圖取消中共獨立，使中共成爲國民黨的左翼，不僅忽視中國工人階級的作用，也有害於國民革命勢力的團結。

馬林以代表共產國際的資格，挾「訓令」的權威，對張國燾大施壓力；張則以「中共中央」委員地位強項的反抗，雙方怒形於色，幾乎動武。

於是，陳獨秀從中加以協調，要求雙方互相讓步。最後終在大會中以九票對八票，一票之差，通過了陳獨秀的提議：

「全體黨員均應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，但一部份中共黨員可不在國民黨內擔任實際工作，尤其是負中共各級領導工作的同志，不應兼任國民黨的職務，以免混淆中共的獨立面目。同時，爲了加強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影響起見，中共應幫助國民黨增加工農黨員，發展其工農群眾中的組織。」結果，大會宣言中，祇表示「承認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，並希望社會上的革命份子，都集中到國民黨來」；即刪去馬林原擬提出的：「一切工作歸國民黨」、「各項革命工作都是國民黨工作的一部份」等語句。

馬林雖然同意陳獨秀此一措施，但却對張國燾不予諒解，向與會代表大肆指責張反對陳獨秀的領導，違反共產國際的訓令，破壞黨內團結，應予嚴重懲戒。影響所及，此次大會改選「中共中央」委員，張國燾竟然榜上無名，被排斥出局。（按：當選者爲陳獨秀、李大釗、蔡和森、毛澤東、瞿秋白。毛澤東接替張爲組織部長。）

此一結果，據張國燾後來的回憶，他認為：

「我是中共重要創始人之一，也是『中共中央』的正統，地位僅次於陳獨秀。就因為在西湖會議上反對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，從此由中共的正統派要人，降為反對派的首腦。機會主義者、反共產國際和右派等帽子，都戴到我的頭上，這事的確是我政治生涯中的一個重要關鍵。」

國父對他大度包容

陳獨秀不贊成馬林排斥反對者的態度，同時也受到黨內反對意見的壓力，於是希望由「中共中央」分派張國燾一項重要工作，最好回到北京去擔任鐵路工會的領導工作，從速建立起「全國鐵路總工會」。

張國燾接受這項工作，於民國十二（一九二三）年九月回北京，在李大釗友善的協助下，進行順利。

十一月初，胡定康再來中國，接替馬林共產國際代表的位置，特地和張國燾談起馬林。他表示共產國際並不贊成馬林的作法，並說：「加入國民黨，正是實現聯合戰線的具體方式。中共加入到國民黨裏面去，不是遇事聽命於國民黨，或成為國民黨的左翼，而是要支持和團結國民黨內的革命派，反對國民黨中不革命的份子。」同時，對張曾受馬林打擊，表示同情。

北方的政局，因為曹錕賄選總統，愈演愈壞；一般青年很熱烈的傾向國民黨，而使國民黨的組織在北京蓬勃發展起來。因此，張國燾對國共合作的前途表示樂觀，曾經應國民黨在北京的機關報「新民國」

雜誌之邀，發表「廣州新氣象」一文，號召所有革命份子合作。

民國十三（一九二四）年初，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，張國燾當選為北京代表，偕同李大釗於一月十日到達廣州。當他從蘇俄顧問鮑羅廷之處，看到已經草擬的國民黨章的草案時，特別敏感的顧慮到中共黨員的立足安全。他主張：「國民黨章應儘量擴大民主，黨員除應遵守國民革命的政綱之外，可以有不同的意見存在；如此，跨黨的共產黨員才能立足。」這與當時大家的主張：「一個國民革命的政黨，應該是一個組織嚴密的黨，才能負擔起它的歷史使命」大相逕庭，就是一些中共的同志，也把他看成是一個對國共合作專潑冷水的人。

開大會以前的某一個晚上，他參加了孫中山先生所舉行的宴會。孫先生即席發表演說，他以為：

「俄國革命的勝利，是得力於俄國共產黨組織的堅強，但其所標榜的共產主義却失敗了。俄國現行的新經濟政策，與太平天國所實行的天朝田畝制是相類似的。俄國尚不能實行共產主義；那麼，中國實行三民主義是最恰當了。」

同時，他更否定「階級鬥爭」之說，他以為：

「在中國祇有大貧與小貧的區別，並無階級的顯明分別。」

中山先生「希望將所有的革命者都團結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」的偉大胸襟抱負，並未能感悟張國燾。

張却藉口趕在二月七日以前回到北京，舉行「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」，不待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完

，先行離開廣州。

中山先生知道此事，乃於一月廿二日晚約他晤談，不但未因他提前退席而稍存芥蒂，並且對他熱心職工運動，多所慰勉。當夜，特派親信人員送張一函，附有二千銀元，託他捐贈給「鐵路總工會」，祝賀此次「鐵路工人代表大會」的成功，預期張國燾個人工作，能順利發展。甚至還支持張國燾當選為第一屆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。中山先生如此恢宏氣度，不愧為一賢明的革命領袖。

張國燾回到北京，「鐵路工人代表大會」如期於二月七日秘密舉行，到會代表廿人，張向大會發表演講，提出「工人應擁護國民革命，力爭工會自由和改善工人生活」等主張；並以大會名義，致函中山先生，感謝他支援鐵路工人的盛意。當即成立「全國鐵路總工會」，以鄧培為委員長，張國燾為總幹事，在北京設辦事處。

國民黨北京執行部也很快成立，中央委員丁惟汾、王法勤、李大釗、于樹德等經常在部辦公；張國燾也常去參加會議、辦公。

五月十五日，有人以炸彈偽裝禮品，送到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家，炸傷顧家僕人三人，引起北京當局大捕革命黨人之事。他們以為北京的民衆運動，鐵路工人的活躍，都是革命黨人幹的；同時國共兩黨素來反對顧維鈞的對俄政策，因此判定顧宅炸彈案，一定也是國共黨人所為。而張國燾又是國民黨公佈的候補中央委員，於是張國燾夫婦被捕入獄（張的太太楊子烈，是中共最早的女黨員，是年二月剛與張結

婚，正担任「新民國月刊」的校對和發行工作，接受軍法審判，永遠監禁。

十月，直奉二次戰爭爆發。廿三日，馮玉祥反戈入北京，囚禁曹錕，暫時控制了北京局勢。廿五日，張國燾夫婦才獲得「無罪開釋」。

張出獄以後，主要任務，仍是領導鐵路工會。

民國十四（一九二五）年一月，中共在上海舉行第四次代表大會，張沒有出席，但仍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，主持「中央職工委員會」。

「中央職工會」委員有李立三、劉少奇、鄧中夏、項英、林育南、李啓漢、王荷波等；張國燾為主任委員，主持決策，日常工作由劉少奇助理。

民國十四（一九二五）年五月一日，由北方的「全國鐵路總工會」、華中的「漢冶萍總工會」、廣州的「工人代表會」、香港的「海員工會」出名召集的「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」在廣州舉行。當天的「勞動節紀念大會」有五萬人參加，會後示威遊行，除各行各業的工人外，還有廣州四郊的農民和市內各校學生，情緒熱烈。

大會推選廿五人組成「中華全國總工會」，林偉民為執行委員長，劉少奇、劉文松為副執行委員長，張國燾被選為上海辦事處處長。

張國燾即利用此一職務，在「五卅」運動時，迅速成立「上海總工會」，推動工作。

「五卅」運動結束後，「中共中央」成立軍事部，由張兼任部長。

北伐潛赴武漢活動

關於中共滲透到國民黨內，興風作浪之事，在中共第四次大會時，即有「要爭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」的決議。自孫中山先生北上逝世後，在蘇俄顧問鮑羅廷翻雲覆雨、跋扈陰險的操縱運用下，愈演愈烈，終有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年三月廿日「中山艦事件」的發生。

當時，國民政府已在廣州成立，黃埔軍校校長兼廣州衛戍司令、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蔣中正，正準備北伐，中山艦長中共黨徒李之龍受人指示，想乘蔣校長搭乘該艦由廣州返回黃埔時，強迫他離粵，直駛海參崴，送往俄國，以消除共黨竊篡國民革命領導權的唯一障礙，阻撓北伐。幸被蔣校長事先發覺，立即出動部隊，逮捕李之龍及各軍黨代表的共黨份子，收回中山艦，搜繳共黨份子所操縱的「省港罷工委員會」的槍械，包圍各俄國顧問住所，監視其行動。十四日，國民政府解除俄國顧問十餘人的聘約；廿四日，季山嘉（軍事顧問）等人離華返俄。事變結束後，鮑羅廷匆匆自俄國趕回廣州（三月廿日，鮑羅廷適在俄國），根據史達林的意圖，採退讓妥協態度。

在廣州的中共黨徒，原先很憤怒，本想聯絡各方勢力，反擊蔣校長。但蘇俄已採取退讓辦法，仍留在廣州的俄國顧問，也對蔣校長很恭順。於是，由上海趕往廣州的張國燾，在中共廣東區委會緊急會議上，報告「中共中央」決定採取妥協政策。接着，他和周恩來晉見蔣校長，氣氛融洽。據他事後回想說：「那

次談話，至少明白表示了並無徹底排斥中共的意向。」

等到蔣校長所提出的「整理黨務辦法」，在鮑羅廷相當尊重的氣氛下，獲得協議，並經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委員全體會議通過後，幾瀕破裂的國共關係，終於漸漸的緩和了。

共黨的陰謀既已失敗，北伐的阻力亦告消失。五月廿一日，國民黨中央全會發佈對時局宣言，決定北伐。七月九日，蔣校長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，誓師北伐。

北伐軍進展神速，九月七日，已攻佔漢口、漢陽，並已對武昌之敵形成包圍。張國燾等在「中共中央」緊急會議上建議將「中共中央」遷移到武漢去，未能通過；但却決議派張爲全權代表趕往武漢，指導湖北區委，發展工農勢力，團結國民黨左派，爭取北伐勝利；一直到十二月間鮑羅廷到武漢以前，中共在武漢的工作都是由張直接負責。

當時，張國燾忙於積極增加工農勢力的比重，「中共中央」也陸續調動得力黨員多人，工運方面劉少奇、李立三，軍事方面李和林、惲代英，農運方面毛澤東等來武漢。由於工作的繁重，十一月，張又兼任中共湖北區委書記的職務。

十月十日，在漢口成立「湖北全省總工會」，選舉向忠發爲委員長，李立三、劉少奇、項英爲副委員長（適逢國民革命軍攻克武漢，更增加工人的狂熱情緒）。總工會之下，設有工人糾察隊。

中共的工會運動雖然發展蓬勃，但幹部們却發生過份左傾的變幹偏差；勞資爭議和罷工浪潮，隨着組

織的發展而洶湧起來。工人不但常用暴力手段，不可理喻的對資方橫施壓力；甚至有拘捕人員，戴高帽子遊街等事件。而且自己也不遵守勞動紀律，工會負責人往往因工會的活動，妨礙了自身在工廠的工作；其他工人店員，也有在工作時間內不聽資方指示和工作不力等情事，嚴重的影響到社會安定和生產的正常供應。

於是，「實行共產」的謠言到處流傳，而「反共」的意趣，也因此普遍的醞釀，逐漸形成。

十二月，鮑羅廷偕同部份國民政府要人抵達武漢，以後，開始「反蔣運動」。這是鮑羅廷在史達林的授意下，主動發動的。因為上年三月廿日「中山艦事變」，俄共對蔣校長的讓步妥協，祇是一種臨時的退却；現在，他們以為「反蔣」的時機已經成熟，所以鮑羅廷也不再隱藏此一忍耐已久的「反蔣決心」，而放手大幹一場了。

因此，當張國燾去見鮑羅廷，鮑羅廷即表示：「好了，我們又在一個新地方晤面了。我們要開始新的生活，做一篇新文章。」「在廣州時，我曾說過北伐打到北京，國共便要分家；現在看來，分家已經大為提早了。」

在鮑羅廷陰謀操縱，中共推波助瀾之下，「反蔣」手段的毒辣，是無所不用其極的。

當蔣總司令指揮國民革命軍二、六兩軍進攻南京時，鮑羅廷竟然授意在武漢被左派把持的「國民政府」，密令第六軍軍長程潛，逮捕蔣總司令，以免他於攻克南京後，建立一個足以抗衡武漢的政治中心。

同時，共產國際也有訓令：「必須設計一切方法，激動國民群眾，排斥外國人。」張國燾除了鼓勵第六軍的政治部主任中共黨員林祖涵配合行動外，並立即以機密方法，通知上海「中共中央」，就近協助程潛。結果，程潛未能逮捕蔣總司令，林祖涵却於三月廿四日攻克南京時，指使中共黨徒，鼓勵地痞流氓及潰兵，假扮國民革命軍，於上午九時起侵入英美領事館，殺害館員，侵入教堂，殺害外國傳教士，搶劫金錢物品，企圖激起列強與國民革命軍的直接衝突。

下午三時半，停泊在南京江面的英美軍艦，砲轟南京城，示威洩憤。一直等到程潛和第二軍代軍長魯滌平進城，出面收拾，事態才告平息。

蔣總司令聞知此事，乃於廿五日命令何應欽、程潛、魯滌平、賀耀祖等負責維持南京治安，保護外僑生命財產。並於卅一日在上海招待英、美、德、法等國報社記者，申明國民革命軍的立場，是求中國國際地位的平等，絕不以暴力方式，達到取消不平等條約與收回租界的目的；對在華的外僑生命財產，負責保護。但也表示對此次英美軍艦砲轟南京，將要提出嚴重抗議，要求賠償損失。

上海方面，當國民革命軍展開攻勢行動時，上海的國民黨組織，領導勞動群眾實行罷工，以為響應。

中共黨徒乃乘機組織「工人糾察隊」，擁有槍械，企圖發起暴動，成立勞工市政府，挑起列強與國民革命軍的衝突。蔣總司令進駐上海後，為了防制共黨的暴動，為了不使上海成為武漢之續，他所指揮的國民革命軍乃與工會、商會合作，於四月十二日收繳大約三千多人的「工人糾察隊」的槍械，監視中共煽亂

分子，上海才告安定。

四月十八日，國民黨中央常會與國民政府委員會，秉承孫中山先生遺志，定都南京。五月五日，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及各部部长聯席會議，通過清黨原則，七日組織清黨委員會，制定排除共產黨員的「清黨條例」，通告各地黨部。於是，上海、南京、江蘇、浙江、福建、安徽、廣東、廣西、四川各省都開始實施清黨。中共份子乃不能再從事公開活動，多數逃往武漢。

顯而易見，鮑羅廷與中共搞的「反蔣運動」，以及共產國際希望挑起國民革命軍與列強的衝突，引起列強出面阻撓蔣總司令控制東南的陰謀，徹底失敗了。

遭受分共打擊 準備南昌暴動

武漢方面，爲了打開局面，鮑羅廷主張由武漢向北進兵，與已經參加國民革命軍的馮玉祥會師，進而打開經由外蒙與蘇俄聯絡的路線；同時，還可以與在山東的軍閥張宗昌妥協，對南京形成包圍作戰。這一辦法，得到陳獨秀等人的贊同。

張國燾反對此一路線，他贊成羅易（共產國際剛剛派來武漢的代表，印度人）的辦法：由武漢揮軍南下，奪取廣東，並在兩湖推進農民革命，準備建立獨立的「蘇維埃」政權。

爭論的結果，採取鮑羅廷的北進案，進軍河南，突破奉軍防線。正在前方決戰聲中，五月廿一日，長

沙發生一件著名的反共事件：「馬日事變」。

原來武漢方面，最失人心的，除了工人運動，還有「農民運動」；尤其是湖南的「農協鬥爭」。在「有土皆豪，無紳不劣」，「矯枉必須過正」的心理下，打土豪劣紳的辦法包括：「逮捕、監禁、審判、算賬、罰款、戴高帽遊街、殘殺……」等，簡直無法無天，到了瘋狂的程度，引起廣大民衆的不滿，以爲「農民協會」是「不肖祖宗，欺神滅道，主張公妻……」的組織。

軍隊方面，尤其是控制武漢的主力唐生智的部隊，大都爲湖南人，家屬在家鄉，受到「農協」的打擊摧殘，也激起了高漲的反共情緒。唐生智本人也曾經接到報告說：

「農協簡直成了第二政府，干涉各級政府的行政和司法。在湖南境內，如得不到農協的同意，就寸步難行。」

當時，唐爲了維持「反蔣陣線」，祇好暫時忍耐，希望國共兩黨能設法糾正這種過激的行爲。

可是，唐的部屬第卅五軍軍長何鍵，却忍無可忍，於五月十九日通電指摘湖南工農運動搗亂北伐後方；臨湘、益陽等縣的駐軍及團防局，已開始行動，解除工農武裝，佔領工農團體會所。

廿一日（馬日）凌晨，何鍵部許克祥團，在長沙開始大規模的清掃行動，收繳上千的工農武裝，逮捕工農團體重要負責人，佔領「湖南全省總工會」、「農民協會」等場所，隨即聯絡留駐湖南的五個團，一致反共。

此一行動，馬上得到兩湖人民普遍的響應。大家早已不甘忍受共黨的恐怖政治與社會鬥爭，以及「現金集中」、「糧食集中」政策，於是很快的成爲一種普遍的反共運動。

在武漢的國民黨人士，自汪精衛以下，多採取觀望態度；有人指斥中共不及早切實糾正工農運動的過火行動，不約束他們侵犯軍人家屬的行動，才激成此一事變。

一向善於玩弄權術、機詐百出的鮑羅廷，震驚之下，還想親去長沙，加以調解，但遭許克祥拒絕。五月廿九日，唐生智終於也通電反共，於是，整個局勢轉變得對中共非常不利。

正當此時，共產國際却在史達林的授意下，來份電報給鮑羅廷和羅易，希望他們能夠促成實行土地革命、沒收土地；由二萬武裝共產黨員及五萬工農份子，組成新軍隊，消滅舊的軍隊；在國民黨中央委員中，增加工農領袖，代替舊領袖；組成革命法庭，審判「反革命派」。

這當然是不合時宜的一廂情願的想法，羅易却於六月五日當面送交汪精衛，這才使汪大夢初醒。

此其時，國民革命軍從南京、武漢齊頭並進的北伐戰爭，却得到輝煌勝利。五月廿七日馮玉祥部攻佔洛陽；六月一日唐生智部攻佔鄭州，張發奎部攻佔開封；六月二日蔣總司令部攻佔徐州。

武漢當局與馮玉祥約定六月十日在鄭州舉行會議。當時，武漢反共的趨向已逐漸明朗了，馮玉祥是受過蘇俄接濟的，動向如何，尙未表明。張國燾向「中共中央」自告奮勇的前往鄭州，希望能有機會影響鄭州會議，不致損及中共的立場。

可是，當他先和中共的鄭州負責人探詢情況，却間接從馮玉祥部的政治部主任劉伯堅處得來消息，馮玉祥對武漢態度不好，傾向南京蔣總司令。

十日，他還是見到汪精衛，希望汪能對馮作有力的表示，爭取馮支持武漢政府爲正統；至於國共關係與工農運動是可以設法改善的。並且重新保證中共繼續支持武漢政府。汪精衛當時答覆他「可以試試」。但鄭州會議開會時，汪精衛爲了迎合馮玉祥的意旨，大發反共議論，只希望馮能尊重武漢和他個人的地位。

張國燾知道內幕後，回到武漢，在「中共中央政治局」的會議上，主張退出國民黨。雖然對國民黨左派的上層分子不存幻想，但對中下層分子，仍應設法聯絡，取得他們的支持。鮑羅廷和其他委員，認爲此事應先徵求莫斯科同意。

莫斯科的回電，還是採退讓政策，爲了挽救武漢分共的危機，中共應該明白表示尊重國民黨的領導地位；必要時中共黨員可以退出政府，過去若干作風可以更改，但不可以退出國民黨。「中共中央」根據這個政策，於六月廿日發表十一點政治聲明。

可是，汪精衛與武漢當局，在各方面強大的壓力和群眾激憤的怒火之下，終於不得不於七月十五日開始「分共」。鮑羅廷等蘇俄人員，離開武漢，回到俄國。

中共內部，受此沉重打擊，在共產國際的約束之下，不無抑憤難洩之苦；於是，有人積極掙扎，有人

消極失望，有人另尋出路。張國燾認爲莫斯科主要是爲蘇俄的處境著想，而不是爲中共的前途、利益著想，中共應當有一套自己的積極作爲。

當陳獨秀隱藏起來，向「中共中央」表示無法繼續工作，瞿秋白也離開工作崗位，跑到廬山時，張國燾不勝憤慨的說：「難道中共就這樣散夥了嗎？我是絕不甘心的！」

於是，他召集周恩來、蔡和森、李立三等中共中委，舉行政治局會議，決定將「中共中央」政治局暫遷武昌，在當時左傾色彩相當濃厚的第四軍掩蔽下，繼續工作，將群集在武漢的共黨份子，分派到各地，掌握工農力量，準備對抗國民黨。

汪精衛除了「分共」，爲了維持他在國民黨的領導地位，又搞「東征討蔣」。支持他的第四軍張發奎部正向南昌集中，中共認爲最可靠的部隊——葉挺的一個師和周士第的獨立團，也在開往之列。於是，大批中共黨徒，乃至仍與中共合作的國民黨左派，都湧向南昌；有的潛往他處潛伏工作，有的隱蔽在葉挺軍中，準備反抗國民黨。

毛澤東則自動願冒險回到湖南，領導農民武裝暴動。

周恩來接到李立三等自九江來信，主張在南昌發起暴動，由葉挺首先發難，聯絡湘鄂贛一帶工農群眾，形成既反武漢又反南京的中心；然後移師廣東東江，藉汕頭海口，與蘇俄聯絡。

張國燾同意這項主張，未及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，即以中常委名義決定周迅往九江南昌，組成「前敵

委員會」，由周任書記，譚平山、李立三、惲代英、葉挺爲委員，相機處理一切。

七月廿一日，瞿秋白從廬山回到武漢，由於鮑羅廷授意，立即提出改組「中共中央」領導問題，把此次中共失敗的責任，推到陳獨秀一人身上，以維護共產國際與莫斯科的威信。

張國燾非常憤怒，他以爲處此緊要關頭，不急於設法努力挽救中共的危亡，反而先在責任問題上搞鬥爭手段，把責任推到陳獨秀一人身上，那是不公平的。共產國際的政策與事實脫節，才是失敗的主因。

瞿秋白還強調他和鮑羅廷的協議，是爲了政治上的需要，不能拘泥於道義；張國燾則堅持實際政治需要與真理道義，應當同時兼顧。

不久，共產國際又派了一位羅明納茲來華。他從瞿秋白處得知張國燾的基本立場，當即認爲張是陳獨秀以外，中共的第二號右傾機會主義者，是共產國際最不放心的反對派。從此，張國燾受到連續不斷的打擊，最後不得不得不再脫離「中共中央」。

南昌暴動失敗 再被攆斥責難

在周恩來的積極策劃下，以南昌暴動爲起點的計劃即可實現，預計以葉挺、賀龍部以及第三軍的教導團朱德部爲核心。他們要求「中共中央」立即指示暴動方針，應變策略；他們急需蘇俄軍事顧問協助，還有一筆巨款，以及到達東江以後，希望能獲得蘇俄軍火和物資的支援。

可是，羅明納茲起先還通知周恩來積極準備；但等到請示莫斯科後，却表示無錢支援南昌暴動，莫斯科已有電令禁止蘇俄軍事顧問參加，共產國際也有回電，主張不要發動，張發奎部中的中共黨徒可全部退出，派往農民中搞農運。結果，却要張國燾迅即前往九江，傳達此一電令與意旨，停止此一行動。

張國燾祇好萬分無奈的「義不容辭」的去做這件「出爾反爾」的事。

廿七日，他到達九江，立即向惲代英、高語罕、關向應、廖乾五等人，傳達阻止發動的電令。但却遭到嚴厲的反抗，大家認為事情已經決定，何能反悔？並且怒斥共產國際和「中共中央」領導破產，甚至威脅他：「如果你再動搖人心，就要打倒你！」

卅日，他到南昌，與周恩來、李立三、彭湃、惲代英、譚平山、葉挺、周逸群等會談，大家心情緊張，根本不願談到「成功希望」和「改變計劃」等問題。李立三也從實質上說明無法改變的原因：（一）已與賀龍部有密約，取得該部各師長的同意。（二）已密約駐在撫州的第三軍教導團朱德部，和在湖南平江的工農武裝領導人余洒度，按時舉事，響應行動。（三）限於時間，更改不及。（四）限於保密，有進無退。最後，周恩來竟以憤而辭職的姿態，反對共產國際再來干預此事。

素來責任感很濃厚的張國燾，竟然不顧他此來阻止暴動的初衷，反而宣佈支持「前敵委員會」的原有決定，不改變暴動計劃。他本來應當返回漢口，向「中共中央」覆命，但因交通受阻，祇好隨軍前進。但他的領導威信，已受到打擊，除了照常參加「前敵委員會」，已無法挽救當時領導凌亂的局面。

七月廿一日深夜，暴動開始，葉挺、賀龍等部叛軍控制南昌四郊及城內各軍事要地，劫掠中央銀行，搜刮商店，拘捕國民黨員。

八月一日，由中共操縱，用國民黨招牌，成立一個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」的政治機構，抓到一些事先並不知情，事發也不在場的國民黨左派人士如宋慶齡、鄧演達等裝點門面；而以譚平山為委員長，吳玉章為秘書長；張國燾也是委員之一。

八月四日，張發奎和朱培德分別自九江、吉安等地，率部圍剿叛軍。葉挺、賀龍等立即向南竄逃，途經汕頭、潮州，殺人放火，搶劫擄掠，為所欲為之後，逃往海豐、陸豐一帶，與彭湃會合，在「中共中央」的指示下，將「革命委員會」改為「蘇維埃政權」，會合農民，成立「工農紅軍」。但迅即遭到國軍的痛剿，而告瓦解。

「中共中央」迂迴上海，於八月七日舉行緊急會議，出席人員為瞿秋白、任弼時、張太雷、李維漢等人，在史達林的代表紐曼（Neumann）的指使下，發表事先由共產國際準備好的「告全體黨員書」，把中共失敗的責任推到陳獨秀、譚平山、張國燾身上，指斥他們犯了嚴重的「機會主義」，而取消了陳獨秀的書記長，張國燾、李立三、蔡和森、周恩來等在「中央政治局」的職務。

十一月十一日，「中共中央」再舉行擴大會議，決定「建立蘇維埃工農民主獨裁政權，採用自下而上的發動暴動辦法，實現土地革命。」同時，清算南昌暴動，認為暴動其所以失敗，係由於仍然採用國民黨

的名義和旗幟，是一種機會主義。因此，開除譚平山的黨籍（譚即登報聲明脫離中共），張國燾却以「未根據中央指示，去堅決領導南昌暴動；復假傳中央意旨，去阻止南昌暴動」的罪名，被開除「中共中央委員」的職務。

南昌暴動的最先計議，主張最力的周恩來回到上海，見風轉舵，立即表示完全擁護「八七會議」以後的中央，遵奉共產國際的指示，反對機會主義。他不但因此逃避了南昌暴動失敗的責任，反而重新躋進了「中共中央政治局」為委員，主管軍事和特務工作。

可是，張國燾不肯向「中共中央」認錯，所以「中共中央」也沒有安排他的新工作。他的生活極不安定，一方面忙着逃避警探的緝捕，一方面又被瞿秋白等視為「反中央」的首領。

以瞿秋白為首的「中共中央」，在紐曼、羅明納茲的指導下，却把暴動當做不二法門，唯一手段，帶來了一連串的慘敗。其中以十二月十一日的廣州暴動，關係最大，直接影響到中俄正式絕交。

張國燾曾勸瞿秋白放棄暴動政策，改弦更張，遭到拒絕。於是張與陳獨秀計議，另組「農工黨」，即以原來的共黨同志為基礎，擴大其政綱要點仍為「反對帝國主義和實現土地革命」，但不再是共產國際的支部，而是國際主義的友黨。但因陳獨秀的慎重，未能定案進行。

被迫公開認錯 回國斡旋黨務

共產國際爲了彌補「中共中央」所產生的裂痕，謀求黨內團結，特別決定於民國十七（一九二八）年六月在莫斯科召開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；並且不透過中共，直接邀請陳獨秀、蔡和森、鄧中夏、羅章龍和張國燾等五人前往參加。

陳獨秀表示不願再參加中共的領導工作，拒絕出席；於是，張國燾、鄧中夏等應邀前往。

在大會的預備會議上，因爲張國燾被認爲是「反對共產國際的代表」，所以首先應邀發表演說。他很技巧的表示：「中共領導的錯誤，不在於反共產國際，亦不在於違反共產國際的指示；恰恰相反，是太過於依賴共產國際。」同時，對「中共中央」的政策，多所指責，甚至坦率的斥責瞿秋白犯了嚴重的盲動主義。

開大會時，代表共產國際的布哈林作主要報告，承認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代表們，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。大會也批判了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。爲了促進團結，張國燾、瞿秋白仍然當選爲「中共中央委員」及「政治局委員」，但將他二人留在莫斯科，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。「中共中央」由向忠發爲書記，李立三任組織，蔡和森任宣傳，周恩來任軍事，項英任工運；實際上由李立三領導。

中共黨內的紛爭，經過這項大會，總算解決了。原來被認爲是中共左傾反對派領袖的張國燾，被人改稱爲少數派領袖。

七月十七日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，張國燾是中共代表之一，當選爲主席團的候補

委員及候補秘書。大會對中國問題，決議以「推翻國民政府」、「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」和「建立蘇維埃政府」為中心的「十大要求」；成爲此後「李立三路線」的根據。

十一月初，史達林直接處理中國問題，特約張國燾和瞿秋白去晤談。關心到陳獨秀被排出「中共中央」，可能會採取何種反對共產國際的態度和作爲。張國燾認爲陳可能不再追隨共產國際，但也不可能在中國作公開反對共產國際的政治活動。

三小時的談話，使張國燾覺得史達林是一個頗具風趣的現實主義者，並不如外間想像的那樣可怕。可是，他的演繹邏輯是夠冷酷的。任何人如對共產黨有不滿的表示，就會被視爲「反共」，就會被他逮捕，即使是與他多年共患難的同志也不例外。

共產國際六次代表大會以後，「反右傾」成爲最主要的節目。李立三得到莫斯科「反布哈林右派」的鼓勵，在中國大張戈伐。首先開除蔡和森的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」，將他送到莫斯科；接着開除陳獨秀黨籍（陳於十二月十日發表告全黨同志書，強調擁護托洛斯基主張，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，以示反抗）；隨後又和共產國際派在中國的兩個德籍代表鬧翻，斥責他們「右傾」，不能代表共產國際。

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二九）十月十二日，中東事件發生，蘇俄軍隊侵入滿洲里與海拉爾，壓迫我東北地方政府，於十二月廿二日訂立「伯力協定」。並且鞭策中共，要他們「配合城市暴動與農村暴動，奪取幾個政治和工業中心，爭取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」。民國十九（一九三〇）年七月廿七日，彭德懷的「

「工農紅軍」，乘中原大戰甚激烈之際，侵入長沙，佔領五天之久。這使李立三更爲樂觀，認爲「革命成功，爲期不遠」了。

於是，他於八月間制訂一項「全盤革命計劃」，準備集中各地「紅軍」，再度進攻長沙，奪取南昌等大都市，並且要求共產國際立即命令外蒙古紅軍，進攻平津，蘇俄紅軍進攻東三省，以配合中國工農紅軍的革命行動。

他這套把蘇俄行動也牽涉在內的計劃，當然爲共產國際的兩位德籍代表所反對。他却認爲蘇俄紅軍爲了中東路問題向東北進攻，中共會極力配合支持蘇俄，現在該是蘇俄以實力支持中國革命的時候了。如果共產國際不能如此做，就是犯了右傾的錯誤，他將堅決反對。

消息傳到莫斯科，輿論譁然，李立三被視爲「半托洛斯基主義者」，給反對者可乘之機。那時已經回國的陳紹禹（王明）的國際派，立即裏應外合的，站在「擁護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」的旗幟下，反對李立三。

共產國際爲了糾正李立三的錯誤，根據在莫斯科的中共老幹部們的建議，想到派遣負責而有勇氣的張國燾回國去。但必須張國燾公開宣告過去反共產國際是自己的錯誤，現在已經毫無疑問的擁護共產國際的路線。

雖然，張國燾心目中的共產國際，再也不是「世界革命大本營」，而是史達林鞭策各國共產黨人的指

揮所，可是，他如果祇願回國反立三路線，而不願對共產國際表示忠誠，那將立即成爲鬥爭的主要對象。爲了早日脫離苦海，他應允第一次公開認錯，承認「過去對共產國際領導中國革命曾有若干不滿，多半是自己的錯誤；最近一年在莫斯科學習的結果，已經認清了。」並且在發言的紀錄上署名，以示誠意。

民國廿（一九三二）年一月，中共四中全會壓制了李立三路線，使李立三閒散到莫斯科。但也嚴重的打擊了一班反立三路線的老幹部，而以陳紹禹等國際派掌握了「中共中央」的領導機構。

一月廿日左右，張國燾夫婦才回到上海，正趕上何孟雄等十七個老幹部被捕（據說因反對陳紹禹等國際派，在東方旅館開會而全體被捕），大家人心惶惶之時。於是他祇好運用自己的聲望名位，與周恩來、向忠發聯合起來，南北奔波的作團結疏解的努力。

發展「豫鄂皖邊區」被清剿突圍西竄

自從中共被國民黨清除以後，即積極在各山區邊境發展游擊，組織「紅軍」，出現「蘇維埃」面貌。在李立三負責領導「中共中央」時，曾經頒發過十六個軍的番號，其中以「江西蘇區」「毛澤東、朱德、彭德懷等的第一軍一萬五千枝槍，」「豫鄂皖邊蘇區」「鄺繼勛的第四軍一萬枝槍，以及「湘鄂西蘇區」「賀龍的第二軍七千枝槍最具實力；並且已形成一些縣級和鄉鎮級的「蘇維埃」政權。這些游擊區受到國軍和地方政府的清剿壓力，常常大聲疾呼，要求「中共中央」給予人力物力的支援。因此，如何加強「蘇區」和「

紅軍」的領導，成爲「中共中央」的迫切問題。

於是，周恩來提出具體計劃，經議決通過：「中共中央政治局」遷往「江西蘇區」，由向忠發、周恩來、張聞天、秦邦憲等領導前往，另在「豫鄂皖」和「湘鄂西」兩個「蘇區」，設立「中央分局」：「豫鄂皖」由張國燾、沈澤民、陳昌浩前往主持，「湘鄂西」則由原在那裏的夏曦、關向應主持。

當時，「豫鄂皖」包括兩個「小蘇區」：一是以鄂東黃安縣的七里坪爲中心，包括黃安、麻城、光山、羅山四個豫鄂交界的一部份鄉區；一是以皖西的金家寨爲中心，包括六安、霍山、商城三個豫皖邊境的一部份鄉區。

民國廿（一九三一）年四月九日，張國燾到達黃安，以中共「豫鄂皖區中央分局書記」兼「軍事委員會主席」的身份，實施「中共中央」交付他的任務：「擴大此一蘇區根據地，建立堅強的蘇維埃政權，壯大紅軍，以期配合中央（江西）蘇區和其他各蘇區一致行動，爭取更大的勝利」。

十一月七日，中共在江西瑞金召開的「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」，成立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」，毛澤東當選主席，張國燾和項英當選爲副主席。

張國燾努力的目標，政治經濟方面爲：

(一)糾正亂打土豪作風，改善赤區與白區關係。

(二)清除土匪作風，注重政治紀律。

(三)厲行增產節約（先從廣植蔬菜雜糧着手），解救糧荒（不專靠打土豪式的搶劫沒收）。

(四)實施新經濟政策：取消限價，獎勵經商、活躍市場、提高糧食價格、輸出土產品、建立稅收制度、發行紙幣。

(五)改革土地分配辦法：分配的標準，不是平分面積，而以土地收穫量所值市價爲本。

他以宣導與開會檢討等手段貫徹他的做法，兩年以來，雖然有點「進步」，「紅軍」和黨政機關工作人員，每人每月可以領到二元銀元的零用錢，「蘇維埃銀行」也經常存有五十萬斤以上的食鹽。可是，當他問起老農民的感想時，老農民們却以爲：「這比從前所看到的白蓮教、白狼、紅槍會的造反舉事，雖有不同，比較民國十六年的『農協運動』也有進步，但畢竟距離安居樂業和天下太平還太遙遠呢！」

軍事方面，他根據各部隊的戰力素質與軍事幹部的能力操守，加以改編調整，以徐向前接任紅四軍長，負主要責任，調原紅四軍長鄺繼勛爲新成立的第廿五軍長，由「豫鄂邊區」調往「鄂皖邊區」；並以整肅手段，整肅在「鄂皖邊區」活動，有「軍閥作風」的師長許繼盛。

他和徐向前合作，利用「九一八」、「一二八」事變，國民政府蔣主席一度引退的機會，以掌握機動的內線作戰法，和圍點打援、夜間奇襲等慣技，一再各個擊破的擊敗前往清剿的國軍；並且攻陷湖北的淞水、英山、廣濟、黃安，河南的商城，安徽的六安、霍山、霍丘、正陽關等城鎮，極具猖獗燎原之勢。

於是，我中央政府乃於民國廿二（一九三三）年五月廿一日，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兼任豫鄂皖三

省剿匪總司令，對「豫鄂皖邊區」的「紅軍」，作大規模的圍剿。

圍剿的部隊達卅二萬人，豫鄂方面，由劉峙負責指揮，轄有六個縱隊和預備隊，而以第二縱隊陳繼承部（轄黃杰、李玉堂、李思懋、陳耀漢等四個師及二個騎兵旅），以及第六縱隊衛立煌部（轄李默庵、蔣伏生二個師）爲主攻部隊。鄂皖方面，由王均負責指揮，轄三個縱隊及預備隊：第一縱隊徐庭瑤部（轄一師一獨立旅），第二縱隊王均部（轄王均、曾萬鍾二師），第三縱隊胡宗南部（轄第一師及梁冠英一個師），以分進合擊戰法，對整個「豫鄂皖蘇區」加以圍剿。

鄂皖方面，於六月十七日開始進攻，以克復霍丘縣城，確實佔領淝河西岸爲首一目標。經過一番激戰，徐庭瑤部於七月十二日攻克霍丘縣城，徹底擊潰鄜繼勛的「紅廿五軍」（鄜軍僅存殘部千餘人，縮編爲一師，鄜本人則以戰法失誤被免職，而以蔡申熙接任師長）。此一勝利，關係民心士氣極大。卅日，再攻佔金家寨北面交通要道葉家集。

第三縱隊胡宗南部，則自克復六安、霍山、青山鎮一帶，肅清淝河東岸後，復渡河西進，發動總攻。皖西「紅軍」，紛紛竄逃獨山、石婆店一帶（胡部第一師於任務完成後，調豫南歸豫鄂方面劉峙指揮，第三縱隊由梁冠英負責）。

王均再接再厲，下令所指揮的三個縱隊，繼續以金家寨爲目標，入山攻擊，連克獨山、麻埠。

豫鄂方面，由平漢鐵道向東攻擊，以攻克七里坪、新集爲首一目標。當以第二縱隊陳繼承部在北，第

六縱隊衛立煌部在南，自八月二日起分進合擊，連克宣化店、河口鎮、黃陂站、潑皮河、七里坪等地，會攻黃安。

十一日，當第六縱隊的第十師李默庵部由河口向黃安進軍時，遭遇「紅四軍」主力徐向前部激烈抵抗。徐並以其夜晚突襲慣技，反撲第十師，幾乎到達衛立煌總部。幸賴衛本人以及第十師的沉着鎮靜，未受搖撼。天明以後，八十三師蔣伏生趕來增援，一舉破敵，斃傷「紅軍」二千餘人、民兵三百餘人。十三日，再以預備隊八十九師湯恩伯部加入戰場，掩護縱隊左後方安全，第十師與八十三師乃得順利攻克黃安，獲得決定性勝利。

九月八日，「紅四軍」在豫鄂邊區的最後一個重要中心新集，也為第二縱隊陳繼承部所攻佔，十三日再克商城。

廿日，著名的金家寨巢穴，也為第六縱隊衛立煌部所襲克。

當黃安易手之時，張國燾曾在新集附近舉行軍事會議，決定主力突圍西竄的決策，並且留下負傷未癒的卅六團長徐海東為「豫鄂皖蘇區軍區」的總指揮，全權領導區內所有地方武裝，採取游擊戰術，保衛「蘇區」。

當即揚言併力東下，南渡長江，與「江西蘇區」呼應。實則秘密集中兵力於金家寨，南向英山，以一萬六千人的困獸行動，衝破包圍圈，折而向西，於八月下旬，乘夜暗從平漢路王家店附近越過鐵道，向西

北逃竄。担任掩護過路任務的師長蔡申熙，被國軍攔截部隊擊斃。

西竄後的張國燾、徐向前部，經由隨縣、棗陽、淅川、鄖縣、荆紫關、漫川關、商縣、藍田、秦嶺山中、子午谷、佛坪、漢中等地，鑽隙前進，沿途復遭受國軍十次以上的追剿攔截。其中以在棗陽以南的吳家集一仗最爲激烈，損失也最大，共計死亡兵員二千，拋棄傷兵一千。真可謂喪家之犬，到處挨打。

當他們於十一月中旬某一天到達川北通江縣的兩河口後，決定留下經營新的「川北蘇區」。

張國燾統計一下他的實力，原來一萬六千餘人，槍枝一萬二千，機槍一百挺，大小砲三十餘門；在路八十餘日，穿越鄂、豫、陝、川四省，路程五千餘里，遭遇十次以上的戰鬥；祇剩下九千多人，槍枝八千，機槍五十挺了。

建立「川北蘇區」與毛澤東會師懋功

張國燾在進入距離兩河口一百廿里的黃草壩時，舉行高級軍政會議，決定佔領川北的通江、南江、巴中三地爲發展「蘇區」的核心。當時，川北一帶烟毒頗烈，人民大多懶散抽鴉片烟，各方面都很落後；而「紅軍」本身，也殘破疲乏，亟待休養補充。因此，張國燾以爲最迫切的問題，是與四周敵軍暫時休戰，獲得喘息機會；在政治上，應即揚棄「蘇維埃」公式，建立一個爲當地人民所擁戴的政權。

因此，他草擬「紅四方面軍入川綱領」。第一部份要求「紅軍」所到之處立即實行：

(一) 廢除苛捐雜稅。

(二) 減租減息：地租不超過百分之四十，年息不超過百分之卅。

(三) 保障人民安全：決不任意捕人殺人。

第二部份，是與四川人民共同實行的，如分配土地、職工利益、男女平等、統一稅則、提倡文化教育、反對帝國主義和日本侵略，最大的特點，是要求全川人民和「紅四方面軍」合組「四川全省人民政府」。當他們佔領通江、南江、巴中（以後簡稱通南巴）後，就建立各該縣的縣政府，並且嚴格實施禁戒鴉片，以求減少增加兵源的困難。各方面正幹得起勁之際，「中共中央」却自江西來電，對他們脫離「豫鄂皖蘇區」，西行川北，極表不滿，認為是犯了「右傾逃跑主義」的錯誤；並且要求立即放棄「入川綱領」，改用「蘇維埃」政府制度和中共土地革命的一貫政策。又恐怕張國燾堅持己見，不肯讓步，最後竟以撤換張的「中共中央全權代表」地位為要挾。

張國燾苦思熟慮之下，終於讓步，覆電接受「中共中央」意見，一面宣告修改「入川綱領」，除繼續推行廢除苛捐雜稅等條款外，並號召窮苦農民立即實行分配土地，組織工農自己的「蘇維埃」政府，成為「中華蘇維埃」的一部份。

民國廿二（一九三三）年八月下旬，張國燾在通江召開「川北蘇區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」，建立一個省級的「川北蘇維埃政府」。張本人則以「軍委會主席」的身份指揮軍隊，以「中共中央代表」的名義

指導省委工作，集黨政軍事權於一身。

張國燾如此出爾反爾的搞政治號召活動，根本無法激起當地人民的鼓舞參與。當地人民知識水準甚低，從未受過「革命」的洗禮，根本不知共產黨和「蘇維埃」之事，大多數還是受神權命運觀念所支配。談到分配土地，窮苦人民缺乏組織力，不能建立有力的地方武力，地主土豪反而能陰謀詭詐的，一方面造謠挑撥，離間「蘇維埃」政權與人民的關係，一方面却能組成百人以上的武裝力量，發動反「蘇維埃」的暴動，使窮苦人民無法抗拒。

經濟方面，除了嚴禁鴉片，有點效果外，整個「蘇區」領土，一片荒涼景象。居民的糧食和其他積蓄，一部份被「紅軍」消耗了，一部份毀於戰爭；加以田蕪荒廢，疾疫流行，到處都是啼痕。種種因素，根本不能與「豫鄂皖蘇區」相比。只靠軍事上尚有辦法，才能暫時立足。

軍事方面，「通南巴」本來是川軍田頌堯防區，曾經兩次派大軍進攻「紅軍」，都被擊退。張國燾乘戰勝之機，乃一面與漢中的楊虎城部協議互不侵犯；一面集中兵力，襲擊東邊川軍劉存厚的防區，攻佔綏定、宣漢、萬源三個縣城，擄獲萬枝槍械，還有設在綏定的兵工廠、軍火庫、被服廠和積存的金銀物資。

由於上述幾次戰事的勝利，使「紅四方面軍」增至四萬人，不但重慶、萬縣因而震動，同時也促成四川全省軍隊的聯合行動。於是，劉湘就任四川全省剿匪總司令，分兵五路，向「蘇區」分進合擊。軍委會蔣委員長也在四川設立行營，派賀國光為主任，調遣在天水的胡宗南部和漢中的楊虎城部，配合劉湘的軍

事行動。

戰事一直延展到民國廿三（一九三四）年八月，雖然張國燾仍保住他的「蘇區」，可是，檢討起來，發覺「紅軍」的槍枝彈藥，素質越來越低，實際能夠用於作戰的，祇有兩萬，而且多半是土製貨。同時，糧食和其他生活與戰鬥必需品均感不足，長此死守，絕非辦法，必須另找出路。

恰巧，十月以後，江西「紅軍」脫離瑞金根據地西竄的消息傳到「通南巴」，於是，張國燾決定「放棄『通南巴蘇區』，配合『中央紅軍』，力求向外發展」的方針。

當時，張國燾已經有偵察電台，可以截聽無線電訊。於是，自「中央紅軍」竄至廣西貴州邊境時，偵察電台即能每天偵譯國軍行動的密碼情報，提供「中共中央」，極盡了作耳目的能事。

由於國軍追剿的順利，大量軍隊進入四川，張國燾的轉移行動，不能再緩；於是，他想到在北川（縣城名）西北地區與「中共紅軍」會師。本欲前往川、陝、甘邊區建立根據地，但顧慮駐守天水、廣元線的國軍胡宗南部強大，最後決定由蒼溪地區渡過嘉陵江向西突進。

經過一番苦戰，不但渡過了廣闊急流的嘉陵江，而且攻佔北川縣城和江油、平武一帶地區。張國燾再開會決議即以此處為據點，向川西北、甘南、西康東部發展，建立「川康根據地」。同時，他認為對少數民族，政策的尺度更要放寬，「蘇維埃」組織與分配土地，都不適宜在此號召實施；於是他於民國廿四（一九三五）年五月，在北川成立「西北聯邦政府」，而以「抗日反蔣」為重要綱領。

不久，他得到由江西竄逃的「紅一方面軍」已偷渡金沙江的消息，立即實施策應計劃，將總部由北川遷往茂縣，派主力部隊控制松潘以南險要之地，以防阻已佔領松潘的胡宗南部南下追擊。

六月底，兩部份「紅軍」，終於會師，張國燾也趕往懋功，與毛澤東會晤。

毛兒蓋會議發生歧見衝突

張國燾放棄「川北蘇區」，冒險突圍，與毛澤東會師，是爲了顧全整個中共的大局，是有誠意的。可是，却受到他想像不到的猜忌責難，引起爭執與分裂。

毛澤東所率領的「紅一方面軍」，自江西西行之初，原有九萬人，到達懋功時，僅剩下一萬人，砲都丟光了，剩下少數機槍，沒有子彈，步槍平均每枚祇有五顆子彈；而一萬人之中幹部多士兵少，就是朱德自己，也感嘆「紅一方面軍」祇剩一副骨架了。

張國燾的「紅四方面軍」有四萬五千人，兩萬多枝槍，力量雄厚得多，加上張個人在中共的資歷聲望，原超過毛澤東。何況，張過去在「豫鄂皖」與「川北」的政治作爲，早爲「中共中央」所不滿；而張本人對「中共中央」的領導（尤其是蘇維埃政策）也多不滿。凡此，本已經潛在着不和諧的因素，特別是一向缺乏民主素養、不善解決內部爭端的中共，爭執與分裂，成爲必然的結果。

首先，毛澤東、張國燾、朱德、周恩來、張聞天、秦邦憲等六個「政治局委員」和「紅軍參謀長」劉

伯承，在毛澤東的住所，舉行軍事會議，討論今後動向。當時，共產國際已有電令給毛澤東，叫他們向北前進，以外蒙古爲後方，俾能取得蘇俄的有效支援（此卽所謂「北進計劃」）。毛提出討論，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。可是，張國燾却很熱情的說出他的主張，他認爲最好的動向，是前進到蘭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帶，以新疆爲後方，也可收到蘇俄有效的支援（此所謂西進計劃）。但目前最好暫時在川康地區立足，修養整補，訓練騎兵作戰戰術（因無論北進與西進，均須與西北騎兵作戰）。

會議討論三個小時，未達成具體結論，但大多數支持毛澤東主張，但也未否定張國燾主張，而把決定時機，推後到毛兒蓋集會時再說。可是毛的言談態度，對張多所譏刺，使張覺得很不愉快，以爲毛已在游擊戰中養成一種疑忌心理，不用善意去體諒他的所作所爲。

接着，毛澤東利用「中共中央」到懋功後的第一次出版物「布爾什維克報」，刊載一篇由「宣傳部長」凱豐所寫的「列寧論聯邦」文章，攻擊張國燾所搞的「西北聯邦政府」是違反列寧主義的，是違反「中共中央」的「蘇維埃路線」，無異否定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」。

接着，周恩來又來找張國燾，拿出通令全軍的電稿給他看：

「中央政治局決定：中央軍事委員會除由毛澤東任主席，朱德、周恩來任副主席外，加派張國燾同志爲副主席，所有軍隊，概歸軍委會指揮。原一方面軍改稱左路軍，由彭德懷、林彪任正副總指揮，聶榮臻、鄧小平任正副政治委員。原四方面軍改稱右路軍，由徐向前任總指揮，陳昌浩任政治委員。」

毛澤東藉掌握「中共中央」的權勢，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以一紙電令，奪取了張國燾控制「四方面軍」的軍權，而使張在促進團結的大前提下，祇好表示贊成。

接着，「軍委會」即下令「四方面軍」放棄已佔據的茂縣、北川，撤往岷江以西，掩護「一方面軍」向毛兒蓋集結。

接着，又讓秦邦憲、張聞天找到張國燾談論，車輪戰的指責張領導「四方面軍」的缺失，認為「四方面軍官兵之間缺乏同志的友愛和說服教育精神，所實行的是軍閥統治」；一方面又勸他忍耐，不要提出爭端的問題。

接着，負責特務的鄧發也找張國燾，談起要在「四方面軍」建立政治保衛局工作系統之事。這一次，張却不再忍耐，而嚴詞拒絕了。

此外，「一方面軍」的幹部，也發表些誹謗張國燾的言論，說他是「老機會主義」，為共產國際和「中共中央」所不信任。一些派往軍中調查的人，也說他指使「四方面軍」不尊重「中共中央」。

種種事實，使張國燾明瞭毛澤東正聯合張聞天、秦邦憲等留俄派，勾心鬥角的對付他；但他仍想用比較溫和的方法，謀求改進。

一、四方面軍的幹部接觸較多，雙方隔閡也一天天增大。「四方面軍」的人，多為張國燾鳴不平，陳昌浩甚至坦白的告訴張聞天、秦邦憲：「如果中央歧視張國燾同志，將引起四方面軍的重大反感。」

於是，又由朱德出面調解，提出「軍事統一指揮方案」，以「政治局委員一致同意」的名義發表：

「爲了強化紅軍總司令機構，由朱德任總司令，張國燾任總政委，負責指揮全軍。以後戰略問題由總司令部擬定，提交軍委會和中央政治局核准施行。」

張國燾爲了促進團結，再度欣然同意，並立即下令由右路軍（原四方面軍）所轄四個軍中，各抽調一個團補充左路軍（原一方面軍），以增加一、四兩方面軍互相瞭解，徹底合作。他本人也未立即自「四方面軍」調人參加「總司令部」工作，祇要求確立「中央軍委會」與「總司令部」的工作程序，劃分其職權，而欲以無我精神，感格他人。

可是，毛澤東破壞此一統一指揮方案，仍以「軍委會主席」地位獨斷一切，並且變本加厲，繼續發動對「四方面軍」的批評攻勢。突然召開「政治局」與「軍委會」的聯席會議，先令徐向前報告「四方面軍」的軍事狀況，隨即由毛本人爲批評而批評的指責「四方面軍」，張國燾起來答辯，也孤掌難鳴，起不了作用。雖然此會並未作成任何決議，但顯而易見的，毛澤東是用此來打擊張國燾的氣概和聲望。

等到「中共中央」的機構和軍事首腦都到了毛兒蓋，張國燾再建議召開「中央政治局會議」，以澄清黨內的歧見，檢討黨的全盤工作和當前軍事問題。

毛兒蓋會議實際是在距離毛兒蓋廿里的沙窩召開的，由毛澤東、朱德、張聞天、秦邦憲、張國燾五人參加，鄧瑞發、凱豐二人列席。事先戒備森嚴，不准張國燾偕同的任何人進入沙窩。

會議開始，即由毛澤東交出一份預先擬好的決議草案給大家看，要點是：

「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，蘇維埃運動和土地革命已獲得重大勝利，紅軍在反圍剿中也獲得重大勝利；中央在過去時期中，曾發生軍事路線的錯誤，遵義會議已經適當的將他糾正過來了。遵義會議以後中央所執行的都是正確路線，全黨全軍都應該團結在中央的周圍，繼續爲蘇維埃中國奮鬥。」

當時，與會人員面色凝重，惟恐失言干咎，都不肯發言。

張國燾却不甘沉默，但他避免發生意氣爭吵，乃以輕鬆語調，先自我檢討的辯解一下人家對他的誤會。然後申明他要求檢討政治路線，絕不等於推翻「中共中央」。接着他表示不同意這項事先擬好的決議事件，張國燾說：

「蘇維埃運動不是勝利，而是失敗了。其受挫原因，並不是敵人飛機大炮，也不是自己的軍事上失算；而是此一運動不合時宜，不爲廣大群眾所接受。遵義會議肯定政治路線正確，却說軍事路線錯誤，這是倒因爲果。」

憤恨毛澤東背信 另立「中共中央」

張國燾在毛兒蓋會議中主張擱置毛澤東的預擬文件，自由交換意見；另行召開高級幹部會議，吸收新人參加工作；實施黨內民主。

毛澤東拒絕了張國燾的建議，毛認爲現在是軍事行動時期，不能談黨內民主，一切以中央命令行事。結果，會議既未表決毛澤東所提出的預擬文件，也未討論軍事問題，又是不了了之。

可是當他們正爲「蘇維埃運動」是否正確激烈爭論時，史達林却已放棄這個「蘇維埃」法寶，改弦更張，使用「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」的新武器。他透過共產國際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七次大會，加以宣佈，制成方案；並且由「中共中央」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，以「中共中央」的名義，發表「八一宣言」，主張組織「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」。

毛兒蓋一帶，是半耕半牧的藏民集居之所，人口稀少，糧食不足，非可久留之地；加以毛、張等會合後，已有相當時日，國軍正部署新的圍剿行動。於是，張國燾提議「擱置黨內歧見，力求軍事出路」的辦法：

「全部紅軍迅速進入甘肅南部岷縣、臨潭一帶，再依情況決定北進或西進。」

總司令部率領現駐毛兒蓋以西的原四方面軍的第九、卅一兩軍，經刷金寺北進，爲全軍左翼。

徐向前、陳昌浩率原四方面軍的大部份，爲全軍右翼，爲中路打開北上通路。

林彪、彭德懷所部爲中路，掩護中央機關。

董振堂、羅炳輝部爲殿後。」

此一計劃，把戰鬥的重心放在「四方面軍」上，「一方面軍」的任務比較輕鬆，自然爲毛澤東等人所

贊同。

民國廿四（一九三五）年七月，張國燾、朱德、劉伯承等按照計劃率領左翼軍由刷金寺前進，但被大雨水所阻，一連三天，河水陡漲益深，祇好再回刷金寺，中途，即以總司令部名義電令各軍暫停行動。

當左翼共軍阻水的第一天，右翼軍却能攻佔松潘以北一個據點，為中路軍打開一條北上的通道。

毛澤東却不願坐失良機，竟不理會「總司令部」電令，自己下令林彪、彭德懷等「第一方面軍」的一、三兩軍團，以「北上先遣隊」的名義，秘密單獨前進，事先並未通知右翼軍。他所以用「北上先遣隊」的名義，是想讓國軍誤以為他所挾帶的中共中央機關和要員，祇是一個支隊，真正的中共重心仍在毛兒蓋；這是一種轉移目標的陰謀詭計。他順利到達甘南岷縣南部地區後，却電盼「總司令」各路跟進。

張國燾與「總司令部」同人研究，認為毛的單獨行動已經打草驚蛇，國軍已有足夠時間派軍扼守甘南戰略要地，於是，他決定「暫時南進計劃」：

「乘敵不備，南下成都西面的天全、廬山一帶，補充冬季服裝，如遇不利情況，可以縮回西康、藏族地區過冬；吸引國軍注意力，減輕『北上先遣隊』所受壓力，製造明年春夏之交再行北上的機會」。

隨即率軍經阿壩南下，順利到達卓克基，舉行高級幹部會議，右翼軍也來參加，共出席三千餘人。大家對毛澤東突然單獨秘密北上，以為是不顧信義，破壞黨和「紅軍」的團結。甚至有人指責他既然是「中共中央」的領導者，不應有此破壞黨紀與軍紀的行動。於是，在群情激憤之下，通過了兩項決議：

1. 不再承認「中共中央」，另行成立「臨時中央」，推選張國燾爲「臨時中央」書記。電告毛澤東，此後雖不再接受「中央」命令，但軍事行動仍互相配合。

2. 由「總司令部」根據「臨時中央」的決定，指揮全軍。徐向前、陳昌浩率原「四方面軍」向天全、廬山地區活動，董振堂、羅炳輝率部鞏固懋功與卓克基後方，希望能建立「川康蘇區」。

會議以後，名義上中共分裂成兩個「中央」了，實際上，張國燾並沒有進一步強化「臨時中央」的組織和作用，也沒有選出新的「中央委員」，也沒有對原有的「中央委員」加以制裁。當時，所着重的還是軍事行動，而以「打倒天全、廬山吃大米」爲號召；以「廢除苛捐雜稅」、「減租減息」、「平分土地」、「停止內戰，一致抗日」、「與川軍劃分防區，互不侵犯」爲「南下綱領」。

當他們順利攻佔寶興，接近天全、廬山之際，却遭受國軍空軍的迎頭痛擊，一次空襲中，即被炸斃三百人之多。加以國軍薛岳、周渾元兩個有力縱隊的追剿，祇好結束「南下計劃」，而於當年九月退回懋功及大金川一帶的集鎮。繼而壓迫駐防巴丹的劉文輝部退往瀘定，而在靖化、黨壩地區留下來，苟延殘喘。

由於糧食不足，不得不於十月底，冒險翻越大雪山，到達比較充足的道孚、爐霍、甘孜地區。此地區喇嘛勢力特別大，採政教合一制，張國燾的那一套「綱領」不能提出，祇好儘量以和藹態度取得當地人民的諒解合作，解決糧食供應問題。

甘孜的「活佛」，曾對張國燾說出他對「紅軍」的觀感：

「如果紅軍處境好些，不會比劉文輝壞；可是它現在窮困，搜括超過劉文輝。」

自民國廿四（一九三五）年十一月到廿五（一九三六）年六月，他們在西康與劉文輝部隔折多山對峙，相安無事，乃得集中力量，從事訓練、補充衣物等工作，為奪取河西走廊和新疆預作準備。

西進之師覆沒 去陝北與毛會合

毛澤東自毛兒蓋率部北上，原有一萬多人，沿途遭受國軍截擊，損失慘重，祇剩四千餘人，於民國廿四（一九三五）年十月廿日在陝北瓦窯堡附近，與原在陝北的劉子丹、徐海東（原在豫鄂皖留守，因國軍清剿，才逃抵陝北，與劉合流）會合。次年二月，為了解決陝北的糧荒，大舉渡河侵入山西，却在同蒲路被國軍擊敗，劉子丹就殲，死傷極重，殘部退回陝北，從此不敢再作軍事冒險，積極從事「統戰」活動。

共產國際為了傳達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」的新策略，調處中共的分裂，特派林育英回中國。當他抵達陝北後，立即電告張國燾種種情形，明白揭示今後中共的口號應當改為「聯蔣抗日」。

張國燾百感交集，他以他最初原主張實行「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」，因為共產國際的指示，才改採加入國民黨的「右轉」政策，碰了釘子；又急劇的改走極「左轉」的「蘇維埃」道路，又碰得頭破血流；如今又回到當初的起步點，再搞「聯蔣」；真是一大諷刺，同時也是中共的悲哀。經過一番討論，終於覆電林育英，熱烈擁護此一新政策。

林育英鑒於陝北、西康雙方意見已趨一致，乃覆電提議黨的統一，雙方不再以中央名義命令對方，由他暫時担任雙方聯絡人。陝北方面，由張聞天具名通電同意林育英的辦法；張國燾也覆電贊成。兩個「中共中央」之事，遂告結束。

陝北搞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」軍事方面的對象是楊虎城和張學良。楊虎城早有勾結，張學良處則利用俘獲的張部團長萬毅，說服他回去向張學良「苦諫」，要求「停止剿共，一致抗日」。接着，中共即派人去西安與張學良接洽，籌建西北抗日局面，並且要求在川康的張國燾部，也開到西北來，原來的「聯蔣抗日」，變成「聯張反蔣抗日」。

民國廿五（一九三六）年六月，賀龍的「第二方面軍」和蕭克的「第六方面軍」也到達西康，與張國燾部會合。此兩部隊的實力，原有兩萬人，現在祇剩五千人，而且已經合而為一，仍用「第二方面軍」的番號，以賀龍、蕭克為正、副總指揮，任弼時、關向應為正副政治委員。

當任弼時充份瞭解中共在毛兒蓋分裂的經過，他認為雙方都有成見，但凱豐那篇指責「四方面軍」和張國燾的文章，大不應該；毛澤東秘密率部北上，是不適當的，但「四方面軍」的反對呼聲，也加強了他的疑忌；卓克基會議決定成立「臨時中央」，太過份了。最後，他要求雙方拋棄前嫌，和好合作。

由於上述種種因素，加以前此林育英來電，曾表明史達林很讚許張國燾的「西進計劃」，他認為，如果中國紅軍能控制新疆和甘肅的河西走廊一帶，蘇俄將予必需的軍需供應，協助訓練工作。因此，當疲勞

的「第二方面軍」休息一個月後，張國燾乃決定全師北進。由劉伯承、任弼時、賀龍率「第二方面軍」和羅炳輝部爲右路，出甘肅的岷縣、靜寧進至海原一帶的甘北地區；「總司令部」則率原「四方面軍」和董振堂部爲左路，經岷縣，取道隴西、通渭，折而向西，奪取甘肅的河西走廊。

右路軍出發後，起初頗爲順利，但到了天水，却被胡宗南部痛擊，損失很大，祇好向寧靜以北地區急退。

左路軍人多勢盛，攻佔會寧、靖遠縣城，準備由靖遠附近西渡黃河。陝北的彭德懷也率部前進攻到同心、海原一帶；徐海東也率部前進到打拉池地區，策應他們。

靖遠雖然是渡河的好地方，可是缺乏渡河工具。爲了製造渡河工具，需要相當時間。而國軍已乘此時機，加強堵截的調度。一面以空軍監視渡口，一面調胡宗南、朱紹良、關麟徵、毛炳文等部自平涼、天水向西向追剿。

左路軍有三萬五千人，爲了慎防空軍轟炸，祇能乘夜晚偷渡，花了三個星期時間，祇渡過一萬多人。其餘總司令部的直屬機關等共兩萬多人，不但無法再渡，而且還在會寧、靖遠的大道上，被追剿的國軍打得焦頭爛額，祇好向東北逃竄，靠近徐海東部，再由打拉池、海原、同心向東移轉，靠近「陝北蘇區」。

渡河西進的一萬多人，歸徐向前、陳昌浩指揮，由景泰沿長城往古浪以北的土門子，直趨武威。可是，當他們進展到古浪時，却被馬步芳的騎兵徹底擊潰，窮追猛打，損失慘重。而胡宗南部也已駐守武威，

嚴陣以待，阻礙了他們滲透西進之路。於是向正在河連灣的張國燾緊急求援。

張國燾與朱德以及毛澤東派來和他接洽的周恩來會商，由於渡河的限制、國軍的監視，使他們無法也無力應援。結果，董振堂陣亡，少數幾百人逃往新疆；也有零零星星的偷逃回陝北歸隊的。

事勢既已如此，張國燾和朱德、周恩來會商局勢。張提議他和朱德率紅軍學校學生前往「中共中央」駐地保安，與毛澤東等會商今後工作。前線部隊（包括四方面軍的第四軍、卅一軍、二方面軍等）暫交彭德懷指揮。周恩來則先赴各縣，料理未了之事，然後再返保安。

從此，「紅軍」又開始合而為一了，張國燾也失去了軍權。

失去權力優勢 飽受殘酷鬥爭

西安事變時，「中共中央」應張學良的要求，將「紅軍」主力移向西安附近前線，由彭德懷以前線總指揮名義負責指揮，與張學良、楊虎城部隊銜接。事變結束後「中共中央」即遷往延安，成為「赤都」。

毛澤東乘遷居的時機，逐漸把「總司令部」所屬的機構，「參謀總部」和「總政治部」等人員，併入他直接指揮的「軍委會」，控制了通訊機構，包攬了中央軍權，一切由他發電直接指揮，總司令朱德和張政委國燾徒負虛名。到達延安後，他又控制了外交權。

民國廿六年（一九三七年）二月，他派周恩來往南京商談輸誠之事有了眉目；於是，他將注意力轉移

向黨內鬥爭，而其首一目標，就是比他資格老，常常有相反意見的張國燾。

事先，製造輿論，將「西進計劃」失敗的責任，都推到張的身上，說他是「逃跑主義」，說他領導「四方面軍」一無是處。

接着把持論公允，調解黨內紛爭的林育英調走。

接着，選定「抗日軍政大學」爲鬥爭張國燾的場所，毛澤東幕後策劃，張聞天、凱豐負責指導，事先秘密部署，臨時再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發動起來。校長林彪以及其他要人，採取隔岸觀火態度。

有些原「四方面軍」的高級幹部很不服氣，向張國燾訴說不平。張國燾還想引咎自責，息事寧人。他以爲「黨內鬥爭並不是以真理爲依據，而是隨鬥爭形勢和力量對比而轉移。現在形勢對毛有利，所以希望一般同志，專心學習，檢討過去工作的錯誤，再不可有反中央的表示」。

可是，你退一步，他進一尺。鬥爭的魔手，並未因張國燾的退讓自責而罷休；反而武斷羅織的確定張國燾的罪狀爲：「右傾機會主義」、「四方面軍的領導破產」、「反黨反中央」；而其所以有這些罪狀，是張根本上有「土匪主義」、「軍閥主義」。

接着，又要求「四方面軍」幹部回到「中共中央」領導之下，檢討過去錯誤，再不受張國燾的影響。可是，許多「四方面軍」幹部，却要求全面檢討，也檢討毛澤東所領導的「中共中央」，是否也有錯誤。

此一反要求，觸怒毛澤東，由「抗大」的副校長羅瑞卿和政治部主任莫文驊出面，以極具侮辱性的審

訊方式，個別的鬥爭「四方面軍」幹部。

如此高壓蠻幹，終於引起「抗大」內部大多數學生的鼓噪。許世友、王建安等十數個「四方面軍」高級幹部，領導四五百學生，企圖立刻離開「抗大」。

爲了平息風潮，由朱德、林彪出面請張國燾去「抗大」發表演說，想藉此寬和一下激怒的群眾情緒。張如約前往，當表示：

「所有『抗大』學生、中共黨員，都不可有違反紀律的行動；但是黨內的鬥爭，也應該在正軌上進行。每個同志，不管來自那一軍，都應檢討過去有過的錯誤，也有權利義正嚴詞的拒絕那些不應有的指責。如果問題不能在『抗大』解決，也不可違反紀律。每個同志都有權將問題向上級黨部和中共中央提出，甚至向共產國際控訴。」

他的演說，雖然平息了「抗大」的風潮，但却使毛澤東非常不滿，認爲他仍在反抗，因而採取更高壓的手段。不但不遵守諾言，釋放被捕的許世友等高級幹部，反而再捕四十多人，連原任「四方面軍」第九軍軍長，現任「抗大」副校長的何畏也被捕了，並且一齊交歸「最高法院院長」董必武審理。

接着，二月廿日，周恩來在距離延安卅里的地方，被人襲擊，受了一場虛驚。當地正是原屬「四方面軍」的駐守範圍；於是，毛澤東又推測係出自張國燾的主使。當天晚上，不但延安宣佈戒嚴，如臨大敵，而且也派兵監視張的住所，斷絕內外。

可是，第二天真相即已大白，駐守該地區的「四方面軍」部隊，已將襲擊周恩來的土匪活捉幾人，供認係攔路搶劫，並未受人主使。

一再遭受疑忌侮辱，張國燾痛心已極，乃搬出延安城，在北面山上找個窰洞，修心養性，表示不再過問黨內之事了。

毛澤東抽人的鞭子並未就此鬆手，當「抗大」反抗的情緒穩定以後，他又與張聞天等出面，以「中央擴大會議」名義，召開「反張國燾的鬥爭會議」，把張國燾也找去參加。當時，主要的「中央政治局委員」周恩來、秦邦憲等多未參加，出席多人，大都爲「抗大」學生。

會議由凱豐爲鬥爭主將，他指出：

「四方面軍對中共和蘇維埃運動，確有過極大貢獻，但這不能減輕張國燾的罪過；因爲張國燾是一貫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。」

接着，他說到「西進計劃」的失敗，竟大嗓門吼叫：「要張國燾抵董振堂的命！」

身爲「中共中央」書記的張聞天，也搶先發言，指責張國燾的「軍閥主義」、「土匪主義」、「分裂中共」，已發展成爲「反黨的張國燾主義」，這已不是錯誤，而是罪惡，應當受黨紀制裁。

毛澤東居然以輕鬆陰沉的態度，以調人自居的表示：

「國燾同志一向有反中央的傾向，曾是『小組織的老祖宗』；現在既然形勢對國燾同志不利，我看，

還是認個錯吧！」

張國燾不得不起來答辯，首先承認成立「臨時中央」的錯誤，但他聲明這是在「蘇維埃」路線走到絕路，應改變政策而未改變時，黨內所發生的歧見，現在早已不存在了。同時，他強調「紅四方面軍」的英勇奮鬥絕不可抹殺，而應當承認是中共屬下一支有教養的、有紀律的「工農紅軍」勁旅。

當時有人對他的答辯不滿意，主張拖出去公審；張國燾也不甘示弱的表示有盡情答辯和反擊的權利。第二天，「中共中央政治局」弄個決議案，批判張國燾的「反黨路線」，但沒有處罰，仍保留他「中委委員」和「中央政治局委員」的職位。

他經過此次鬥爭，意識到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缺陷實在太大，這一極端反動的專制獨裁，會毀滅一切理想。他隱居在郊外，閉門謝客，不接電話，不出席任何會議，也不告假，以示無言抗議。

可是四月中旬，毛澤東却親自率領「中央政治局」的委員們，移樽就教的由延安來到他的住所，商討投誠國民政府的條件。

這又使他已經冷淡下來的心情，熱烘起來。本着他一貫熱愛中共的初衷，考慮雖然不再參加政治局會議，但也應參加一些實際工作。

於是，他接受「抗大」教務長成仿吾的邀請，去「抗大高級班」講授他自己認為造詣很淺薄的「馬克思經濟學」。

生命遭受威脅 無奈棄暗投明

抗戰開始，七月下旬，中共軍隊改編爲第八路軍，已經大致商擬定案，中共投誠國民政府，參加抗日戰爭之事，已成定局。國民政府曾經派一個軍政視察團到延安，瞭解狀況，溝通意見。毛澤東尙邀請張國燾參加接待座談，一致強調擁護蔣委員長，共赴國難，抗戰到底的誠意。

可是，當八月廿日左右在洛川召開的「中共中央擴大會議」上，毛澤東却支持張聞天根據「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採取使沙皇政府失敗的政策」所提出來的「中共在抗戰時的基本策略」：

「應該一箭雙鵰，使日本和蔣介石和一切反動勢力相繼失敗，最後勝利歸於勞苦工農大眾和中共。」接着，毛澤東對此一策略詳加解說，他認爲：

「抗戰決無倖勝之理，前此中共強調抗日，祇是爲了解決國內矛盾。現在抗戰既已爆發，大家不要爲愛國主義所迷惑，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；今後主要的任務，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，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游擊根據地。今後，中共和八路軍，仍應該完全遵照中共中央軍委會的指示辦事，在國軍中絕對的維持獨立自主。凡是國民政府軍委會以及各戰區司令長官對八路軍下達任何命令，都應該先報告延安，聽候處斷。凡是不利於八路軍的任何命令，概應以各種藉口，予以推脫。」

「八路軍的內部體系，仍維持紅軍規模，不得變更；在敵後各地所發展的抗日游擊根據地，也應該秉承延

安的指示，自成體系。

在國民黨區域內的中共組織，除少數人可以露面外；仍須保持地下組織的特性，展開對國民黨的政治批評，尤其要反對漢奸和妥協活動，爭取群眾。」

張國燾聽到這番議論，不以為然，立即發表相反言論，他以為：

「抗日戰爭是民族自衛戰爭，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的爭霸戰；二者不能相提並論。現在既已經與國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，就不能再提出使蔣介石失敗的主張；祇有推動抗戰到底，影響他在內政上實施若干改革，求取進步。」

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，是使日本侵略失敗；抗日的全體中國人，不分黨派，都應獲得勝利。」
接着，周恩來也對毛澤東的意見，有不同看法，他以為：

「中共應從積極抗戰中，提高其政治地位，過去說過與國民黨精誠合作，共謀抗戰勝利；今後，不可在事實上有表裏不一致的表現。」

八路軍不可公開違抗南京政府命令；但可以在形式上奉行國民政府的法令，而實際上保留自己的精神。戰法上，在有利情形之下，可與日軍進行較大規模的運動戰，即使蒙受較大損失，在所不惜，用以爭取民心。」

其他與會人員，或多或少的表示不能完全同意毛澤東與張聞天的意見；大體主張「應當委曲求全，爭

取抗戰勝利」。

毛澤東看到形勢不利，提議休會三天，復會後，搞出一個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」，和一項「中共任務決議」，照前次會議張聞天和毛澤東的意見，加以增修，刪去「要使蔣介石失敗」、「中共八路軍應在獨立自主的原則下行事」等語句，增加「八路軍在極有利的條件下，才進行較大規模的運動戰」等字樣，通過結束。說的是一套，做的又是一套；實際上，毛澤東仍照他自己的主張行事。當八路軍開赴前線作戰時，他還是指示他們：「一分抗日，二分應付國民黨，七分發展壯大自己」的決策，並且要分以下三個階段來實施：

第一階段：與國民黨妥協，以求生存發展。

第二階段：與國民黨取得力量平衡，而與之相持。

第三階段：深入華中各地，建立華中根據地，向國民黨反攻。

毛澤東爲了表面上安撫張國燾，又提出請他擔任「陝甘寧邊區政府」主席的職務；他當然謙辭。毛澤東、張聞天又保證凡邊區政府所管轄之事，無論對內對外，全由張國燾主持，黨決定支持他；再不讓同志們因爲過去的事批評他。並且以促進黨內的團結，應付抗戰局面等話題來打動他。他祇好應允（國民政府發表該邊區政府主席爲林祖涵，副主席爲張國燾；林祖涵經常在西安，張國燾最初以副主席代理主席。可是，毛澤東、張聞天這一次對張國燾的友好姿態，完全是虛偽的，實際上他們想辦法打擊張國燾，

使他的「邊區政府主席」不能有任何作爲；尤其防範他利用職權建立對外關係，不遺餘力。他們向外散佈謠言，誣指他反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，過去「蘇區」一切壞事，都是他所作所爲；甚至八路軍遲遲不肯開赴前線，也是張國燾的部下不願抗日；儘量破壞他對外交響，阻撓他與外人相見。

不久，負責指揮「西進計劃」部隊的陳昌浩潛赴延安。十一月中旬，「中共中央」召集中共延安積極會議檢討陳昌浩，又藉此掀起一場「反對張國燾」的鬥爭。

首先，毛澤東、張聞天指責張國燾在洛川會議上的發言，表示對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」抱有右傾觀念，對蔣介石也有投降思想。接着，在張聞天領導控制之下，運用一班少不更事的黨員學生，在連續一個星期的會議期間，以「土匪」、「軍閥」、「反黨」那一套帽子，集中攻擊張國燾和陳昌浩；似乎中共過去的一切錯誤，都是張國燾搞的。

最後一天，張國燾提出總答辯，以示抗議，曾經很沉痛她表示：

「同志們批評我的話，我不願多加答覆，僅指出幾點毫無事實根據的。我要請你們設身處地想想，你們將我痛罵得不成樣子，我這個邊區政府主席還能夠做得下去嗎？在此抗日緊急關頭，你們沒有將時間用在準備抗日的工作上，卻費了一個星期的時間，在這裏大聲疾呼的圍剿我，究竟目的何在？」

那些受人指使的「鬥爭小將」，不但不受感動，反而更加狂妄的指責他「承認錯誤，不夠徹底」，「沒有放下反抗武器」，進而謾罵：「張國燾同志是中共中央一個發亮的蒼蠅。」會議主席張聞天不但加

制止，反而含笑欣賞，這使張國燾怒不可遏，立即離開會場。隨即表示辭去「邊區政府主席」職務。

第二天，毛澤東又找他去談話，挽留他的辭職，並且解釋這次鬥爭，原是檢討西路軍失敗的經驗，不料又牽涉到兩個中央對立的事；請他不要介意。笑裏藏刀，張國燾啼笑皆非之下，祇好敷衍幾句，再不提辭職之事。

可是，事情並未就此罷休，毛澤東再暗中掌舵，支使他人對前往延安和張國燾團聚的太太楊子烈（共產黨員）和不滿十二歲的兒子，加以歧視和侮辱，使張國燾覺得他過去的聲望和為人的尊嚴，都已蕩然無存。極端失望之餘，他於十一月間，就有計劃的將「邊區政府主席」的職責，推交秘書長潘自力代理。潘調走後，逐漸轉移到任修權身上。

正當他灰心喪志，為脫走暗作準備之下，却來了一件新的刺激；留在蘇俄的王明、陳雲、康生，乘坐一架飛機，於民國廿六（一九三七）年十二月下旬某日由莫斯科來到延安。

次日，即舉行「中共中央政治局」會議，首先由王明以史達林特使的神氣，發表長篇演說，闡述莫斯科對於實施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」的新解釋為：

「中國抗戰的成敗，具有國際的重要意義。如果中國能夠充份發揮抗戰力量，給日本以長期有力的抵抗，這將使日本無力向蘇聯進攻，對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前途大大有利。

此次國共合作，應力求其穩固與久遠，彼此互讓互助。中共既是主動與國民黨要好，就要拋棄以往國

共間的仇恨。

中共不應再自視爲無產階級的政黨，而應爲代表中國人民的政黨；不僅代表無產階級利益，也代表所有人民和全中國民族的利益。這種放棄階級觀念的進取精神，也是共產國際在第七次代表大會之後，要求各國共產黨，在反法西斯蒂的人民陣線中，所應持的態度。

至於國共之間爭奪政權的問題，那是將來的事；中共應主動的把這個問題，推到抗戰勝利以後去。」王明這番話，大出人想像之外，毛澤東受到當頭棒喝，非常尷尬。張國燾雖然覺得此一見解，要比毛澤東「一面聯合，一面鬥爭」高明一些；但仍然沒有澄清將來中國可以走民主化道路，仍祇是爲了莫斯科需要中國拖住日本的一種權宜策略而已。

然而，事實還有更出人想像之外的事，王明居然指責張國燾是「托洛斯基派」（簡稱托派），他之所以在毛兒蓋與毛澤東等鬧意見，成立第二個「中共中央」，是受到「托派」的指使；並且對張說明此次經過新疆時，已經處決了李特、黃超、俞秀松、周達文、董亦湘等「托派份子」了。

這使張國燾大受刺激，李特等人，是他的部下或友人，絕非「托派」份子。王明竟以揣摩史達林清除「托派」的意向，不讓辯白的擅自將他們謀殺，還要向他威嚇誣栽，那麼，他自己未來的處境，可以想像得知。至此，他覺得中共的一切事，都已超過了講理的範圍，也無法申訴；而且也無申訴的必要。

同時，他覺得毛澤東的所作所爲，不擇手段，追求個人勝利，是不折不扣的反動的帝王思想，與近代

共產主義思想毫無共同之處。另一方面，整個共產國際也完全變質了，它早已脫離從馬克斯以來歐洲工人運動的軌跡，而變質為史達林式的獨裁、恐怖主義。

於是，張國燾於民國廿七（一九三八）年四月四日，利用代表「邊區政府」前往陝西中部縣參加祭黃陵大典的機會，脫離中共，隨同政府派往主祭的西安綏靖主任蔣鼎文，前往漢口，歸依我中央政府。

周恩來、王明、秦邦憲正在漢口，知道此事，曾當面阻撓他脫離中共；沒有結果。於是，「中共中央」與共產國際相繼宣佈開除他的黨籍，並發表指責他的文字，指責他：「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信任，對中國革命表示絕望，進行破壞抗日團結」等等。

公開發表言論 指斥中共政治路線錯誤

當然，張國燾未便就此沉默，乃於是年五月廿日發表「敬告國人書」，除了駁斥「中共中央」對他的指責，說明他本人「擁護政府抗日，貢獻一切，為國家民族効力」的立場外，並對「中共中央」政治路線的錯誤，加以指明。他說：

「第一：中國革命的性質，是全民性的國民革命，任務是內求統一，外求獨立；而就革命動力而言，城市市民與鄉村中小地主及自耕農，都佔極大數量。這些階層對外積極反對侵略，對內並不代表統一的封建勢力；所以除去封建的舊勢力而外，廣大國民群眾都是這一革命積極參加者與擁護者。」

中共對此並無深切的瞭解，因此，經常以急進的主觀上之幻想，代替中國社會發展之客觀條件，機械的了解了民主革命的陣容，只有循着蘇聯十月革命的唯一途徑。更錯誤的是不瞭解革命客觀形勢，而採用諸多錯誤政策，客觀上對於可能參加的廣大革命力量，竟予以過當的摧折。

中國國民黨領導之對內統一運動，其目的原為反對封建割據，亦係形成全民對外之先決條件；應當確認其為進步的革命步驟。中共昧於正義，貿然將階級鬥爭和民族解放，勉強予以聯繫；處處以階級利益抹煞民族利益。

第二：中共對中國國民黨之認識，亦極不正確。中共初則認為國民黨只是代表地主資本家的階級利益，繼又認為國民黨為法西斯主義之分派，國民政府為親日政府。

但就三民主義的本質言，就國民黨的組成成份而言，就國民政府及蔣先生之過去政策而言，此諸估計顯非事實。

中國國民黨實繼承中國革命之優良傳統，它推翻滿清專制政府，創立中華民國，北伐後逐漸完成統一中國的任務，迄今尚坦負著神聖抗戰建國的重任。即以此次抗戰而論，舉國上下，一致奮起，為中國歷史上所僅見。將士犧牲在五十萬人以上，尤復再接再厲。此諸明顯事實，無論何人，均不得不承認此為蔣先生領導成功之明證，國民黨革命精神發揚之實例。

蔣先生為舉國一致所公認之最高領袖，當此國本飄搖，千鈞一髮之際，挺身肩負此民族興亡之責，忠

誠謀國，中外同欽；凡我國人，均不應藉口某些枝節問題，吹毛求疵，別謀發展，以快私圖。

所以，那些認爲『國民黨具有兩面性，在目前抗戰是革命，抗戰勝利後是不革命』的謬誤觀點；不僅否認由抗戰勝利而展開之革命光輝，而且對於正在進展中之抗戰建國偉大工作，亦必然予以嚴重損害。

第三：中共策略路線錯誤之具體表現，卽爲不顧革命所需要的客觀條件，而爭取領導權的鬥爭。十年以來，現已證明『蘇維埃』口號完全與民族利益背道而馳。就中共本身組織言，它久已退出產業區域，走向偏遠地帶，失其應有之群眾基礎，它已起了質的變化，已不是無產階級的政黨。但却不斷的在進行軍事陰謀與暴動，以從事持久的阻撓內求統一與外抗強敵的鬥爭。

第四：中共主張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』，在形式上改編紅軍，取銷『蘇維埃』政權，停止土地革命，表示服從中央政令，但實際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錯誤思想與派別成見，嚴格維護其小組組織的利益；因而減弱現階段抗戰建國的神聖工作。

吾人近來習聞中共宣傳，有所謂『共同領導、共同負責』、『共同綱領』等說話，仍不免是一種爭取領導權之陳舊思想，毫無放大眼光以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爲己任之氣魄。保存實力，保持邊區政府與某些游擊區域的特殊地位，以徐圖發展，乃其真正目的之所在，抗戰合作，不過爲達到此目的之宣傳手段。

據中共之意見，所謂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』，諸凡與其意見相左之抗日分子，皆放在『統一戰線』之外，而一律打倒；所謂合作，凡中央政府管轄之地，皆任其作誤謬宣傳；而陝北邊區，則視外人租界，封鎖

尤嚴。如此作法，豈以爲人盡可欺耶？」

張國燾根據以上分析，又以抗戰建國的基本觀點，作出下列建議。他說：

「第一：中共同人，只有在確認國家民族利益高於一切之原則下，真誠擁護蔣先生領導的抗戰建國運動，毫無保留的實行三民主義，務必言行合一，不得再作與此相反的宣傳和組織。

第二：無論任何情況之下，國民政權和軍隊應完全統一。但望中共同人能根本破除『抗日聯軍』之成見，使八路軍國軍化。邊區既不可當作中共之根據地，也不應形成特殊區域，更不宜自定法律，深閉固拒，排除異己，效法軍閥割據。總之，邊區政府現已無存在之必要，應即還政中央，以昭大信於天下。在中共所領導之游擊區域，亦應秉命中央，充份發揮其抗戰作用。

第三：一致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，從事實踐中央之外交政策。」

劫後心灰意懶 晚享天倫福蔭

張國燾抵達武漢，由蔣鼎文陪同他晉見蔣委員長。蔣委員長除派戴笠照顧他的生活，保護他的安全外，並令陳立夫與他長談，詢問他今後願意做何工作。他堅決表示不能担任黨政方面任何職務，祇希望政府暗中支持他辦一定期的民營刊物。正在籌商中，因武漢戰局危急，政府準備遷往重慶而無結果。

當時，廣西當局會歡迎他去遊覽定居。可是，當他應邀前往桂林時，廣西建設廳長黃公度（共黨份子

），却在所辦的「建設雜誌」上，將共產國際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議案全文刊出，有意戲弄譏嘲。他祇好立即前往重慶。

他到重慶以後，國民黨曾安排他為組織部的設計委員，並推薦他擔任國民參政會第三、四屆參政員，以清高的身份立場，與聞國事。但他因為中共的周恩來、王明、吳玉章也是國民參政員，他懶得與他們相見，所以他很少出席參加會議；即使偶一出席，也不表示意見；以致未能申張正義的在參政會場公然駁斥中共欺世盜名、破壞抗戰團結等事實。

因為他是江西人，所以抗戰末期，政府又安排他為江西省臨時省議會議員。戰後，任命他為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。可是，他就任不滿兩月，却在參加一次省務會議，討論建設廳擬訂的修整全省公路計劃時，他反對「義務徵工」，主張按工計酬，如果省府無此經費，可由救濟總署撥款捐助。省主席王陵基和建設廳長以為，為修建公益事項而「義務徵工」，是已通行無阻的法令，如此次破例意外給酬，則此後其他事項，難乎為繼，所以未曾接納他這自問出自熱忱的建議。但言詞之間，有譏諷他係延安來投之人，不明法令之意。於是，他憤然辭職，前往上海，籌辦「創進」雜誌。

大陸淪陷，張國燾先來台，然後赴香港，與顧孟餘等創立「民主戰鬥同盟」政團，創刊「中國之聲」雜誌，由張任社長，「戰盟」的宣傳部長李微塵為主編，生活費用由「戰盟」支付。可是，籌辦不久，他又因為不能與李微塵相處，而辭去社長職務。

當時，韓戰已起，國際金價上漲。他爲維持今後生活打基礎，特地將他僅存的五千元美金，投入炒金市場，專門買漲；結果，全軍覆沒，一貧如洗。幸虧他長子海威在香港「聖士提反學校」擔任數學教師，待遇很好，才得維持一家簡易的生活。

後來，他接受美國肯薩斯（Kansas）大學的邀請，撰寫「張國燾回憶錄」，窮四年之力，完成百萬言巨著。從此，依靠此書版稅，維持生活。

民國五十六、七（一九六七、六八）年間，中共在香港發動長期暴亂，他因爲與中共大有恩怨，而其長子海威、三子渝川，均在加拿大就業，於是，他夫婦決定前往加拿大多倫多，與海威同住，享受天倫之樂。

他的太太在香港時，已經因跌跤跛了一腿，民國六十六（一九七七）年聖誕節，他自己的右腳中風麻痺，未便再累及均有職業的兒媳，乃即申請住入免費的老人病院；他太太也遷入養老院自行照料生活。

當他滿八十二歲的那天，海威特地接他來家，團聚祝壽。當他知道台灣十項建設成功，又進行十二項建設時，表示欣慰；對於大陸上「祇有當權老幹部享受特權，一般人民普遍饑餓，沒有自由可言；四個現代化，成爲四個空話」的情形，憤怒的指責：「毛潤之（澤東）這個魔王死後還是遺害無窮，他必遺臭萬年。」

民國六十八（一九七九）年十一月三日，多倫多大雪不止，天氣奇寒。張國燾睡在窄狹的病床上，轉

身時，覆蓋的毛毯掉落床下，他自己因為中風，無法拾起蓋好，叫人不應，竟自下午五時起，大吐大嘔兩小時，不治去世。

國民黨仁至義盡 歷史殷鑑垂久遠

張國燾的一生，已如上述。

有人以為張國燾脫離中共來投以後，國民黨未能善加運用，利用他在中共的身份地位，轉來分化中共，打擊中共，甚至有人主張幫助他重建共黨，通過決議認真國共合作，努力抗戰，執行國際統戰策略，取得史達林信任；付予半個或一個淪陷省主席的地位，付予某戰區副司令長官或某特區司令長官的職務，配備三、五萬人的兵力，指揮新四軍和他的舊部以及一些敵後武力，使他在黨、政、軍各方面的勢力和聲望，超過毛澤東，在國民黨的大力支援下，把毛澤東搞垮。那麼，沒有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，與國民黨共同抗戰、建國，中國人民是可以容忍的。

此說殊有問題。

先就張國燾本人說：當他來歸之初，就會對陳立夫堅決表示不願担任任何黨政工作。同時，在他當時公開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以及最後的回憶錄裏，也祇指責中共進行政治路線的錯誤，痛恨史達林排除異己的殘酷鬥爭手段，反對毛澤東、張聞天等人的陰險狡詐的伎倆；而不是從根本上反對馬列共產主義，更對

中共有像親生兒子樣的感情。甚至他還說過：「中國共產主義者，無論在一起或暫時分離，總是背靠背在作戰；我們有爭執，但也相互依存；我們主要的努力，也始終是對付敵人；任何時候，也不會因內爭而忽略了對外。」因此，任何欲利用張國燾來分化、瓦解中共的想法，是不切實際的。

再就中共的組織說：中共自民國十年發展到抗戰期間，由赤手空拳到有武裝部隊，慢慢壯大，並非僅靠一人之力；同時，還要受到共產國際的控制影響。何況，張國燾來歸之初，即已公開宣佈脫離中共，不再是黨員；並無欲藉外力，與毛澤東從事奪權鬥爭，捲土重來之意。「中共中央」和共產國際也已先後開除他的黨籍，中國國民黨如何能支援已經失勢的他重建中共組織，把延安的「中共中央」搶過來？

張國燾原有重新入主「中共中央」的機會，那是在川西毛兒蓋與毛澤東會合之時。當時他有「以大吃小」的實力，和足夠指責毛澤東的理由；但他却以「黨內團結」的胸襟，對心懷叵測的毛澤東，忍讓禮讓。等到毛澤東瞞着他先行率隊北上之後，他才感到受了詐騙，又迫於陳昌浩等部下的激憤，另立「中央」。不但未能從實質上得到「中央」的實權，反而留此話柄，成爲以後毛澤東發動黨羽一再鬥爭他的武器。

再就共產國際說：自國共第一次合作起，張國燾即不大滿意共產國際不切實際的干預中共的行動。當他在莫斯科親眼看見史達林整肅布哈林等高級幹部的冷酷無情，早已警戒在心。而史達林對他的個性強，不肯俯首貼面的唯命是從，早有惡感。何況，此次張國燾其所以毅然脫離中共的動機之一，就是王明打着史達林的旗號，指責他是「托派」份子，他害怕被殘害。因此，要讓已經宣佈脫離中共的張國燾，再以

忠於執行國際統戰策略，來爭取史達林的信任，取得中共正統地位，這是不可能的。

再就軍政方面說：司令長官、省主席是統治某一方面的軍政大員，負有指揮全面作戰和治理地方的重大責任，必須在黨、政、軍各方面有相當的淵源關係，在軍事上曾有戰績威望，在地方上曾有政績聲譽，還有其本人也要有高深的資望和卓越的能力，始克勝任。張國燾雖說曾為中共的首領之一，曾為「邊區政府」的主席（實際上祇相當一省的行政督察專員），但與我黨、政、軍素無淵源關係，殊難在各方面收到密切配合、互相諒解的助力。過去的游擊戰鬥，是一種叛亂的行動，談不上戰績威望；土改鬥爭，不但談不上政績，而且遺恨在民。何況他並未學過軍事，如何指揮大軍作戰？並無行政經驗，如何協調各方，圓滿施政？政府如貿然畀以方面重任，如何服衆？他又如何能負擔得起？至於由政府下令將新四軍及張國燾過去的舊部，撥歸張國燾指揮，也有問題。新四軍在江南自成系統，與張並無淵源；張的舊部，已編入八路軍，分散到各師，進入山西、河北敵後。何況，共軍的行動，並不是指揮官一人所能決定的，而受制於政委，如無政委副署，指揮官的命令無效。師以下的團、營、連級都有政治指導員，也和政委樣的施行職權，層層節制。而政委、政治指導員則聽命於中共黨委會，所謂「黨指揮槍」。因此，不管政府給張如何名義，中共也不可能政府在政府的一紙命令之下，讓新四軍及張的舊部聽張指揮！

至於張國燾來歸以後最適宜的做法，就當時的客觀環境而言，個人的愚見，以為有三個途徑：第一是著書立說，對於馬列共產主義，從理論上批判其錯誤，不合時代與國家需要；從事實上指斥其罪惡，將陷

人民於萬劫不復，而在思想領域裏，現身說法的善盡報國爲民的職責（過去中共反正人士，在此方面頗多極具貢獻者）。可是，他未能如此埋頭做去，而祇向人表示「對付中共，不可強調武力，而應從思想的根本上着手」一句原則話頭而已。

抗戰勝利，他在上海創刊「創進」雜誌（政府會按月分配其官價白報紙），雖說具有反共立場，但爲時已晚，所能發生的作用力量也不大。

第二種工作，是以超然的民意代表立場，在議壇上仗義直言，爲促進全國團結、爭取最後勝利多進諍言；爲揭發中共陰謀，匡正內外視聽多所戮力。國民黨會推薦他出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，但他却一反過去激於義憤、勇於發言的作風，而瞻顧前後，「明哲保身」，未能盡言責，無形中放棄此一隨份報國的大好機會。

第三項工作，是以社會清望的身份，從事救濟慈善事業。政府於抗戰勝利以後，曾任命他爲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，讓他有服務桑梓的機會。救總爲美援機構，經費充裕，政治上的牽制較少，本可放手辦事。可是他又因爲一件普通案件的不同意見，和人家對他幾句閒言閒語，一怒掛冠；短短的幾個月時間，竟然透支法幣四億元之多。政府也因爲他係首先投誠來歸的中共首領，未予追究。

當他在台灣的時節，因爲頂房子上了房主的當，受了點閒氣，又一怒遷往香港，生活並不如意。先總統蔣公對他相當關切，曾經數度向與他有交往的蔡孟堅詢問，並且還指示最好通知他來台灣定居，免得

飄萍在外。當他在加拿大多倫多老人病院養病時，我政府當局還特地贈送給他一筆醫藥費。此事距離他投誠來歸已經四十一年頭，由此可見國民黨對他可謂仁至義盡了。

根據以上敘述，可知國民黨並未薄待張國燾，也沒有「未予善加運用」的失策。而張本人對國民黨往往有一種：「我在國民黨人眼中，是身家不清白的人喲！」的自我疑猜；同時，多年來，對飽經滄桑國民黨力挽狂瀾支撐內憂外患危局的努力，仍不能多所理解，仍然具有偏頗的成見。當他的「回憶錄」於民國五十四（一九六五）年出版問世時，他的太太楊子烈有一篇「張國燾先生的略歷」，曾經有如下的話題：

「抗日戰爭期間，張先生曾任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，表示與國人一致抗日之至誠。此後張先生對國內外交爭，日益置身事外。拿他自己的話來說：『我的激進思想與愛國熱忱，一如往昔；但願遠離這種或那種獨裁專政！』」

已經是民國五十四（一九六五）年了，仍然不分好歹、不明是非的把別人都看成「獨裁專政」，太令人遺憾了。

總之，張國燾是一個富有愛國熱忱，有堅強個性、能說能幹、勤勞刻苦的革命份子。可惜他走錯了路，在共產黨的思想與行動中，他本來具有儒家相忍求全的優點，卻變成被排斥鬥爭的缺點。他的秉性忠厚，難敵毛澤東的陰毒險詐。他太太楊子烈曾經批評他：「國燾滿腦子都是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，實在不配作共產黨徒啦！」幸而，他看到形勢不利，能斷然放下他多年草創奮鬥的事業，棄暗投明，才免於日後可

能像劉少奇樣的慘遭橫死；而且還能享受天倫之樂，在兒輩的照顧之下，安靜的活到八十二歲的高齡。

另一方面，作惡多端，禍害國家的毛澤東，雖然也活到八十二歲，可是一旦亡故，不但妻子被囚禁，人亡家破，絕了後代，而且還要遭到鞭屍，遺臭萬年。

歷史是面明鏡，當我們明瞭張國燾一生的遭遇，和這幾十年來的時事變遷，怎不令人感慨萬千。

